

领导同志谈地方志工作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在中指组五届二次会议讲话时指出，要坚持正确方向，确保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地方志编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要保证地方志事业方向不偏离、发展有保障，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始终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地方志工作。要准确把握地方志事业发展客观实际，脚踏实地，奋发有为；要着力化解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注意牵住“牛鼻子”；要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努力探索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律；要大力弘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地方志工作队伍。

努力编修出党和人民满意的优秀地方志成果。要翔实记录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要坚持政治质量和客观存史的有机统一；要注重地方志成果的多样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志。依法治志，是依法治国的应有内涵，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地方志事业中的必然体现，也是开拓地方志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根本要求。要建立完备的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体系；要坚持依法修志；要坚持依法用志；要坚持依法管志。

他强调，全国地方志系统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服务发展大局，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中心工作开展提供有益借鉴，增强地方志事业发展后劲。将开发地方志资源、发掘历史智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让志书、年鉴、地情书等文献中的文字“活起来”，积极服务中心工作和社会需要，大力彰显地方志的资政和育人价值。

要为中华文化兴盛夯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方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要为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发挥更大作用、作出



更大贡献。一是广泛宣传方志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二是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三是大力传播方志文化，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要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地方志编修，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文明进步，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地方志承担着教化育人的重要功能。在当前和今后的地方志工作中，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深刻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地情特点，要深入挖掘地方志精髓。要注重发挥教育引导作用，展示方志文化，传播地方志承载的历史信息和道德风尚，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本刊综合）

巴蜀史志

(双月刊)
2015年 第4期
(总第200期)

主管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办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马小彬

副主任：王孝平

编委会：

马小彬 王孝平 汪毅
高志刚 陈思禄 李冠华
邱俊 李思源 余正道
王少卿 周正琴 余崇威
陈永毅 夏建平 李勇
譙小松 冉炬师 伟
杨文 李卫东 任真
刘启蓉 尹克发 邓瑜
陶利辉 高伟明 熊倩
孙玉峰

主编：马小彬（兼）

副主编：王孝平（兼）

编辑出版：《巴蜀史志》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熊倩

执行编辑：刘艳平

封面题字：何海霞

本刊地址：成都市永兴巷15号21楼

邮政编码：610012

编辑部电话：(028) 86522061

编辑部邮箱：bsszbjb@163.com

印刷：四川川林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28)86980225

注：本刊如有印刷问题请与印刷企业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卷首

领导同志谈地方志工作

时政辑要

04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

封面故事

05 从古文献中看越王楼的兴废 王志强
07 江油弘扬李白文化正当时 刘术云
09 梓潼的文昌文化 周朝海

抗战胜利70周年

14 全面抗战时期巴中地下党的活动 刘应兵
18 抗战时期什邡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及贡献 党卫贵
20 邻水人民参与修建汉渝公路 丁禹强
23 为保卫南京而殉国的雷震将军 陈学林

红军长征在四川

26 老红军文荣德长征回忆 石京秀
30 党的民族政策在甘孜藏区的成功实践 韩广富
34 红军长征在阿坝的主要战事 尼美
37 长征途中毛泽东与三枚铜元的故事 颜林

史料之窗

39 革命老区通江人民的历史贡献漫谈 闫丕川
42 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的早期传播（1929-1950） 聂文晶

读志用志

45 《鬻熊楚裔记》序言 黄启国
47 读清嘉庆《洪雅县志》 王影聪
48 发掘族谱资源 建设特色文化 温勉双
50 提升认识 促创新 推进工作上台阶 侯宏



读书随笔

52 打望思量“然并卵”

蝉羽

简讯

- 53 全国第二轮省级志书编纂工作座谈会暨精品志书编纂研讨会在山东召开
- 53 何郝炬捐赠《百卷志咏》手稿
- 53 “四川方志系统领导干部培训班”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举办
- 54 马小彬调研新都县、阿坝州地方志工作
- 54 省志编委赴河南、山西、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学习“取经”
- 55 王孝平调研南充、遂宁及省卫计委地方志工作
- 56 省志编委举办省直部门(行业)年鉴、大事记编纂培训会
- 56 追忆革命先烈 坚定跟党信念——省志编委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 56 严守党纪国法 提高能力素养——王孝平为机关党员讲党课
- 57 《四川省志·政府志(1986-2005)》编纂工作会议召开
- 57 《四川省志·国土资源志(1986-2005)》初审会召开
- 57 《四川省志·烟草志(1986-2005)》编纂工作启动大会召开
- 57 “成都方志”走进校园
- 58 德阳市志办开展“方志文化四进”活动
- 58 绵阳出台《实施意见》
- 58 广元多举措推进地方志工作
- 59 内江召开2015年地方志工作会议
- 59 乐山县干班开展读志传志用志活动
- 59 南充认真学习贯彻工作会精神
- 59 广安出台贯彻省“两办意见”文件
- 60 魏文通调研巴中史志馆工作
- 60 雅安召开党史方志工作会议
- 60 李静表扬眉山市志办工作
- 60 甘孜试点地情书籍开发及藏文志书出版
- 61 凉山出台“两办”文件《实施意见》
- 61 成都市锦江区地方志工作出新招
- 62 成都市武侯区方志馆开馆
- 62 双流召开年鉴编纂及年报工作培训会
- 62 北川召开县志初评会
- 62 资中发文推进方志事业发展
- 63 井研志办送法律志书进社区
- 63 峨边志办开展依法修志执法检查
- 63 马边全面推进乡镇部门志编纂工作
- 63 康定扎实推进年鉴编纂
- 63 乡城四举措助推年鉴组稿提速增效
- 64 稻城开展送志书进寺庙活动
- 64 西昌贯彻落实州史志工作会议精神
- 64 德昌制定《实施意见》
- 64 普格召开年鉴编纂业务培训会
- 64 金阳召开州级评审意见落实工作会议
- 64 美姑认真贯彻落实“两办”《意见》



出版时间 2015年8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1—265X

国内统一刊号 CN 51—1616/K

邮发代号 62-311

国内发行 四川省报刊发行局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广告许可证 川工商临许(2001)153号

定 价 7.00元

本刊部分图片系资料图片，请作者与本刊联系以奉稿酬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届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7月7日至8日在成都举行。

全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分析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形势任务，对新阶段我省扶贫开发攻坚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审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东明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贫困地区。四川作为全国扶贫开发攻坚任务最繁重的省份之一，依然面临贫困面宽量大程度深、贫困群众致贫返贫原因多重叠加、贫困地区发展制约因素多等严峻挑战。

全会强调，推进扶贫开发攻坚，必须按照中央“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和扶贫开发总体思路，认真实施《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手段，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采取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深入实施“四大片区扶贫攻坚行动”“五大扶贫工程”和“五个一批”扶贫攻坚行动计划，贯彻《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严格领导责任，强化社会合力，加强基层基础，坚决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全会提出，要按照“五年集中攻坚、一年巩固提升”的要求，确保全省每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万左右，到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全省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上，实现乡乡有标准中心校、有达标卫生院、有便民服务中心，村村有硬化路、有卫生室、有文化室、有宽带网，户户有安全饮用水、有生活用

电、有广播电视，让贫困地区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

全会指出，扶贫攻坚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在目标任务上，必须注重脱贫致富与全面小康有机结合，确保同向同步达标；在总体思路上，必须注重加快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相互促进联动攻坚；在实现路径上，必须注重精准扶贫与区域开发有机结合，走出双轮驱动路子；在着力重点上，必须注重夯实基础与提升能力有机结合，根本改变贫困面貌；在推进方式上，必须注重政府主导与社会动员有机结合，切实增强整体合力。

全会指出，推进扶贫开发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必须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突出问题；必须采取更加务实有力的政策举措；必须加强组织领导。

全会还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

从古文獻中看越王樓的興廢

□ 王志强

越王楼位于绵阳市涪江东岸、龟山之巅，始建于唐高宗显庆年间，因唐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贞刺绵州而兴。今之越王楼为绵阳市人民政府历时十年所重建，2013年正式开放。

历史上最早的越王楼是唐代的建筑，惜早已“灰飞湮灭”。明代有人这样评价越王楼：“越王楼之名，几与井干、丽谯争胜，猗与盛矣！”“井干”“丽谯”都是汉以前的天下名楼，后人常用这两座名楼相提并论，足见其影响之大。加之此楼又是唐太宗的第八个儿子李贞任绵州刺史时亲自监造，所以古往今来，不少文人墨客讴歌它为天下“唐家帝子楼”。楼因人名而出名，人也因楼名而传世。

越王楼，其实是李贞任绵州刺史时的府衙，楼名是在他死后才因其爵位的封诰而得名“越王楼”的。为了显示其皇家身份，李贞到绵州后，大兴土木，建造了当时就名扬天下的高楼大厦——绵州州衙。身为皇亲国戚，再加上他那因反武则天失败而服毒自杀的悲剧性结局，因此这些尽奢豪侈的“大手笔”似乎也能为时人理解和宽容了。总之，“越王楼”留给了后世，成了绵州历代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成了今天我们绵阳人民的一大骄傲：

早在唐代我们这里就出现了天下第一楼，而且引来了不少文人学士的歌咏。

在历代文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中，最著名的首推杜甫的《越王楼歌》：

绵州州城何磊落，
显庆年中越王作。
孤城西北起高楼，
碧瓦朱甍照城廓。
楼下长江百丈清，
山头落日半轮明。
君王旧迹今人赏，
转见千秋万古情。

这首诗作于唐宝应元年（762），仅距越王李贞建楼百余年。其时楼还在，而杜甫又客居于绵州，这是他亲眼所见的笔录，真实可信。诗中最有记实意义的是前四句交待了该楼的建造时间是显庆年中；建造者为“越王”；楼的方位在“孤城西北”。当时的绵州州城——巴西县城的方位，正在今天的开元场一带；楼居于“西北”，正是今天的东方红大桥头涪江东岸的龟山所在地。“碧瓦朱甍”是直接描写楼顶的色彩。从该诗的描述中，我们大约能了解到越王楼的一些基本情况：唐代越王李贞亲自监造的越王楼落成于唐显庆年间，它矗立在古绵州城的西北方，碧绿色的琉璃瓦，朱红色的屋脊，把整座绵州城衬托得

更加雄奇壮美、错落有致。

唐代还有一位亲临该楼的见证人，他就是中唐时期任绵州刺史的樊宗师（字绍述）。他写有《越王楼诗并序》，由于他是绵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故他在该诗的“序”中有“蹇蹇予始登”的记载。这里的“蹇蹇”，指忠直的心态；全句可理解为“怀着十分真诚、惶恐心情的我第一次登临此楼”。可见同杜诗一样，樊诗也是“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值得可信。可惜记载该诗的版本较多，文字出入较大。明代天启年间编纂的《成都府志》，清代同治年间编纂的《直隶绵州志》，以及民国21年编纂的《绵阳县志》，均收录了此诗，但都不尽一致。今以明天启《成都府志》的记载为准。诗的“序”中这样描绘作者见到的越王楼：“楼重轩叠飞，明门窗蒙伞”。樊刺史职掌绵州时，越王楼已不再是绵州府衙，只是作为前人留下的府第供人参观、仰慕罢了，但其雄姿依然可见：一重又一重的高楼，纷层叠致，栏轩依旧，檐宇临飞；宽敞的大门洞开，楼上紧闭的花窗已蒙盖上了掩雨的布帷，整座楼已空无一人。另外，樊刺史在诗中这样描绘越王楼：“危楼倚天门，如闾星辰官；榱榑龙虎帷，洄洄绕雷



风……。”“危楼”，高楼；“天门”，传说中的上天之门，由于神话中的天国在西方，故此唐代指楼在州城的西北方；“闾”，城曲重门，《直隶绵州志》和民国《绵阳县志》误写为“闾”字；“榱”，椽子；“櫓”，斗拱；“洄洄”，昏乱貌。这四行诗句可以这样理解：高大的越王楼紧靠（座落）在绵州城的西北龟山上，犹如天宫的大门一样庄重威严；楼的屋顶木椽和斗拱上，全部覆盖有龙和虎的图案；人在楼内就象站在了半天云中，四周响彻的雷声、风声振耳发聩，让人感到头晕目眩。

从杜、樊二位的诗文，可以了解到唐朝时期越王楼的大致容貌。可由于该楼是木质建筑，保存的时间必然有限，不知是战乱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唐代后期的地方文献已无关于此楼的记载了，而只有关于楼基——“越王台”的记录。对楼基记载最早、最为详实的是《绵州图经》。“图经”是汉唐时期最为流行的一种图文并茂的书版。可惜我们今天已看不到此种书的全貌，只能从散佚在各种史书的引文中，窥其一斑了。《绵州志》上就有这样的记载：“按《绵州图经》：‘越王台在州城外西北，高百尺，上有楼。唐高宗显庆中太宗子越王贞为绵州刺史作’”。百尺之高的楼台，足有30多米，相当于10层高的楼房，似乎太夸张了，不可思议。但是，如果连同现仍俯卧在东方红桥头的龟山高度一起计算，相差也不大，从山脚下砌石作梯，一直

到山顶不过150余梯。所以“百尺”虽是个约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通过以上资料，我们大致可以描绘出唐代越王楼的初步轮廓：在古绵州城西北龟山头，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楼宇式建筑。从山脚到楼门，需登百余步石梯，早已让人汗颜。高大的楼门，如城池的大门沉重威严。木质楼宇一层一层高耸入云。碧绿色的琉璃瓦在骄阳下，似翡翠的海洋。就在这一片绿海碧浪中，又叠现出一道道彩虹般的红色屋脊，更让人眼花缭乱。楼宇的围栏，一重又一重，直插云天的飞檐屋角，似临空欲飞的大鹏，翱翔在蓝天白云的天际。楼内的墙上和天顶上，按皇室宫廷的色调将龙虎图案浓墨重彩精绘其上。人站在楼内，就仿佛身临天宫，让人心惊肉跳，顶礼膜拜。这就是唐代的越王楼，不仅高大雄俊，而且富丽堂皇、气宇轩昂，不愧为帝王子孙所为。

越王楼在明代曾重建过一次，但其规模和布局远不如唐代。今查明天启《成都府志》，内有李正芳撰写的《越王楼记》一文，记载了重建越王楼的概况。其时唐代越王楼已不复存，仅存越王台了：“绵有越王台，去城北仅里许”。作者只有凭想象，勾绘唐代越王楼：“维时层甍复磴，曲槛回廊；不屋而阁，不虹而桥”。而对明代重修越王楼的情况作了详细交待：当时绵州太守李上林其人，“既出廉俸以置台址，而又庀美材而复楼观”。但远不及前楼：“前祇园，后精舍；左护法，右传灯。东为‘拥翠亭’，

则长松千株为之幕；西为‘净练堂’，则澄波千里为之襟。近又增一阁曰‘清明’，一楼曰‘天籁’。”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明代的越王楼址，已不再是气势恢弘的高楼大厦了，而只是利用了唐代越王楼的遗址，培植和修建了佛堂、花园、松林、房屋、亭阁。在这座园林中，“雅宜春，春有竹州花坞；雅宜夏，夏有月窠云窗。户外秋声，籍灵籁于篁韵；筵前冬赏，寄逸兴于雪涛”。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均可以在此休闲、娱乐。“可以樵香桂迎其斧，可以渔锦鳞赴其纶；可以觴，可以咏。盖江流供其斟酌，而山灵贡其推敲”。由此可见，明代的越王楼址，早已改作凭吊怀古、饮酒作诗、赏月观花的游乐场所了。

到了清代，越王台也几乎消失殆尽。四川著名才子绵州人李调元在乾隆年间重游了该地，写下了《越王楼故垒》一诗，诗中这样写道：“不见越王台，但见清江流”。想必李调元是读过《绵州图经》的，可他见到的只是一泓江水，越王楼的最后一点遗迹也无踪影，因此他睹物思人，感慨人世沧桑、变化莫测：“当年唐帝子，锡土守此邱。美人卷珠帘，笙歌夜未休。鸣鸾忽罢舞，江山生暮愁。惟有江边月，会照城上楼”。

从越王楼到越王台，从越王台再到“惟有江边月”，这座历史名楼从建到废，从废到荒，从荒到无，又从无到建，历经千余年，阅尽人间春色。

江油弘扬李白文化正当时

□ 刘术云

李白是光照千秋的世界杰出诗人，是中华民族灵魂中最富激情、最有浪漫色彩的突出显现。李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四川江油是李白的故乡、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素有“李白故里，诗意江油”之美誉。近些年来，江油市着力弘扬李白文化，李白文化已根植在山水、城市之间和广大市民心中。

“盛唐诗酒无双士，青莲文苑第一家。”公元701年，李白出生在江油，在江油生活学习了24年，留下了陇西院、粉竹楼、太白祠、磨针溪、天宝山、大匡山、太白小道等遗迹游踪和许多轶闻趣事、2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他25岁时怀“济苍生，安社稷”之志，“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离开家乡，从三峡出川，南泛洞庭，东游吴越，高居安陆，后北上太原，东到齐鲁，移家任城。李白“三入长安”“赐金还山”，开始漫长的游历生涯，从此走向世界，

成为诗国巨星、人文奇峰。

李白是江油人民的骄傲。故里的灵山秀水、淳朴民风陶冶了李白豪迈飘逸的性格，铸就了他瑰丽多姿的诗魂，从这里扬鞭天涯，纵横四海，超越时空，走向永恒。1200多年以来，家乡人民一直怀念李白、追忆李白、纪念李白，守望着诗仙的家园。随着历史的延续，江油逐渐认识到李白的思想、生平、遗迹以及炼道、饮酒、游仙、任侠等生活，特别是李白的诗歌、李白的精神、李白的风物构成的李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优秀文化，是江油具有垄断地位的人文品牌，它作用于城市，形成了城市独特的文化生态和精神个性，提升了城市品位，从而增强了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古今尊国士，中外仰诗仙。早在1963年，江油对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李白故居陇西院、太白祠等清代建筑进行了维修。紧接着开始筹建李白纪念馆，大文豪郭沫若题写馆

名。1981年，建成面积达40亩的李白纪念馆，让诗魂永驻；后陆续修建了包括文化馆、图书馆、文管所、博物馆在内的文化设施。之后，李白文化体系建设全面展开。在纪念李白诞辰1300周年时，开发、建设了面积达300亩的太白碑林，将李白的诗“立起来”，成为全国最大的以李白诗为主题的露天博物馆。与此同时，成立了四川李白研究会；创办了“国际李白文化资料中心”“青莲诗社”“太白诗书画院”“太白艺术团”。编辑出版了《李白》《走近李白》《李白与江油》《李白与四川》《李太白的故事》《李白的传说》《李诗猜读》《李白蜀道难新考》等50多种书籍。陆续举办了“国际李白文化节”“太白诗会”“李白诗词吟唱会”“海峡两岸李白学术研讨会”“中日李白之声联谊会”“中华世纪坛——李白故里馆藏精品展”“同一首歌走进李白故里”“李白故里世界华人诗词大赛”“甲申年公祭李



白”“李白文化论坛”“李白诗歌奖”“太白灯会”等文化活动，掀起了弘扬李白文化的热潮。

李白文化学术交流和研讨，文化节庆典活动，以李白及其诗歌为题材的文艺创作，乡村文化旅游节、民间的民俗活动和各类纪念活动，充分彰显了李白故里——江油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

李白故里诗风盛。感悟着诗仙的灵气，江油蒋雪峰、蒲永见、陈大华被誉为诗坛“三剑客”。蒋雪峰的诗集《锦书》获四川省文学奖之后，又出版了新诗集《从此以后》；刘强、敬丹樱等诗歌作品多次发表于《诗刊》《星星》等报刊，全市已推出诗集10多部。江油的诗歌创作方阵，8次亮相报刊杂志，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市委、市政府从2013年设立了太白文艺奖，每两年对优秀的文艺作品，以及新加入省、国家级会员给予重奖。

历史悠久的雾山石刻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雕艺人精雕细琢的《太白砚》《学士砚》被文人雅士争相收藏，供不应求。青莲粉竹楼内的李白诗意蜀绣也走进了千家万户，美丽的绣娘形成一道亮丽的景观。

江油为发展文化旅游，将“李白故里”进行商标注册，成为全国第一个城市理念注册

的商标，并广泛应用到诗仙阁酒、太白花茶等知名产品上。出台优惠政策，积极开发建设李白文化旅游资源，包装营销李白文化旅游产品和线路，促进

了江油文化旅游的迅猛发展。

李白纪念馆、李白故居分别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形成李白故居——李白纪念馆——窦圉山为主的李白文化之旅，成为探源李白文化、感悟盛唐遗风的理想之地。2014年，江油的旅游总收入达47.6亿元。

在江油，李白的元素已融入这座美丽的城市。李白大道、诗仙路、诗城路、明月路等成为江油的符号。李白文化已融入江油人民的生活之中：走太白路、行太白桥、游太白公园、住太白大酒店、品太白花茶、喝太白酒、吃太白宴、唱李白诗，欣赏李白诗词吟诵和演唱成为江油人生活中重要内容之一。写李白、画李白、演李白、书写李诗、讲李白故事也蔚然成风。有人还在读书台下，用400多亩油菜花、小麦种出“李白头像和千年李白回归大地”图案，被省旅游局定为最美摄影点之一。

溯匡岫贤踪，仰先生亮



节。目前，江油正进一步整合李白文化资源，擦亮“李白故里”品牌，开发李白文化旅游产品，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业。加快规划1000公顷、总投资120亿元的李白文化产业园建设，计划用3—5年时间，把青莲建设成为国际诗歌小镇。

近年来，江油还不断加强横向联系，弘扬李白文化。先后赴湖北安陆、山东兖州、安徽当涂等李白主要游踪地考察学习开发李白文化旅游的成功经验，开展文化合作。今年9月，“李白诗硬笔书法大赛”“李白游踪地摄影作品展览”将在江油举办的绵阳市旅游发展大会暨李白国际文化节与观众见面。

李白爱月，月爱李白。据了解，央视也将在太白碑林举办“中秋晚会”。目前，筹备工作已经启动。

（作者单位：江油市文广新旅局）

梓潼的文昌文化

□ 周朝海

位于剑门蜀道上的梓潼县是文昌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文昌祖庭所在地，享有“文昌帝乡”的美誉。文昌文化是由民间对文昌帝君的信仰和崇拜为表征而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骨骼和主干，以道家思想为源头和血脉，以佛教思想为涵纳和补充的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素有“北有孔子、南有文昌”之称。

文昌文化源于文昌帝君信仰。文昌帝君，又称为梓潼神、梓潼帝君，是道教尊崇、民间信仰、帝王封赠、文人士子顶礼膜拜的司禄主文运的神灵。文昌信仰，是指集天、地、人、鬼、神五位一体的宇宙观念，以天人合一为中心，以宗教仪式或意识形态对人们进行道德伦理、宏仁济世劝善教育，并被潜移默化，普遍接受奉行的宗教民俗信仰，是民间传统宗教的一支。

文昌文化内容深广，它包含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天资孝友，灏气宏仁，启智开愚，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鹭，上格苍穹，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修善修福，利物利人，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忠主孝亲，敬老信友，广行三教，报答四恩，矜孤恤寡，敬老邻贫，劝善止恶，重教崇文等思想精神。集中体现在《文昌帝君阴鹭文》中。其表现形态有：

文昌经籍

据载，在南宋隆兴、乾道（1163—1173）

年间，蜀中道士刘安胜（假托文昌帝君扶乩降笔而编撰文昌经传的肇始人）传道于梓潼七曲山一带，在此编撰推行了《文昌大洞仙经》《大洞法箓》（《大洞法》和《大洞箓》）。乾道末或淳熙初（1173—1189），刘安胜到了成都，主持宝屏山玉虚坛，在此编撰推行了《清河内传》分文昌化书》（又称《梓潼帝君化书》和《文昌司禄紫阳宝箓》）。之后，历代效仿者先后编撰的文昌经籍、经文不少于100种，仅清初刘樵所辑的《文昌帝君全书》就有50种。

文昌经籍的结构，大体是按陆修静、孟智周两位法师的归类，形成“三洞四辅十二类”的体系，分为七个方面：文昌帝君梓潼神信仰的产生形成的神话传说故事；文昌帝君梓潼神的来历、生平事迹、演绎变化的叙述；文昌帝君梓潼神的神性、神格、神职与灵迹传说；文昌帝君梓潼神经籍文书内容、宝诰灵签、符箓的载记；宣传道教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体现文昌梓潼神的宇宙观、世界观、伦理观等哲学伦理思想；宣传儒家的孝友、仁德思想，朝廷忠主孝亲、积功累德的劝善教育；道士修行实践，修持形式，修养方法，包括宗教仪轨、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洞经音乐

《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简称《文昌大洞仙经》，道教《大洞真经》传本之一，出自西蜀，原经五卷，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宗旨，强调设斋诵经、行善积德为修行之要，劝





人安守本分，实为宋元时期道教劝善书之一。传说南宋乾道四年（1168），由文昌帝君以“更生永命天尊”名义“传降”于四川梓潼七曲山灵应庙。

文昌洞经音乐源于谈演《文昌大洞仙经》，是以崇祀文昌梓潼帝君为主的音乐。在弹演经文时，往往采用说唱相间、散韵结合、叙述与赞颂交织的形式，以梓潼七曲山的庙事活动为背景，以劝善戒恶、济生渡死、消灾祛邪、延年益寿为宗旨，强调忠、孝、仁、慈，积善积德。

20世纪80年代，梓潼县组织抢救、发掘、整理编印了《梓潼民间器乐曲集成》，其中有50余首器乐曲与梓潼文昌洞经音乐有关。

1998年，发掘整理器乐曲牌40余首。许州镇有30余人的乐队在演奏这些曲子，使用的乐器有笛子、唢呐、二胡、板胡、碰铃、檀板、小锣、小鼓、木鱼、小磬等，演出前先诵《文昌赞》和一段《文昌大洞仙经》。

2000年，梓潼洞经古乐发掘收集小组与美国李海伦、云南雷洪安、四川音乐学院甘绍成、四川大学王兴平等专家收集到文昌洞经曲谱30余首，同时还收集到《文昌大洞仙经》3卷《文昌赞词》等。

2003年，梓潼聘请甘绍成等专家对文昌洞经音乐进行研究整理，从百余首曲牌中整理出

30余首作为梓潼七曲山文昌洞经乐团演出的常规曲目，如《赞文昌》《柳叶青》《上香曲》《香山顶》《哭皇天》《云里白》《普安咒》《步步娇》《水龙吟》《水落音》《山坡羊》《正行香》《接送曲》《汉东山》《登天梯》《山开门》《南清宫》《反南清宫》《万年红》《文昌出巡》《将军令》《桂香颂》《武陵花》《洞经》《七曲》《五福图》《士子腔》《五丁关》《得胜令》《金狮子》《染红尘》《敬亚子》《奉天乐》《浪淘沙》《起驾出銮》《坛祭》《天女散花》等等。时年，梓潼七曲山文昌洞经乐团应邀到北京演出，中央四台录像播映，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好评。

2008年6月，文昌洞经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昌祭祀

据《华阳国志》记述推算，秦汉时期，梓潼山上就已建造了祭祀树神、蛇神、雷神的“善板祠”，以后称恶子祠或亚子祠。据史料记载，第一个祭祀梓潼神的大人物是后秦王姚萇。

天宝十五年（756），唐明皇避乱入蜀，过梓潼应安史之乱忆平梦兆，首封张亚子为“左丞相”，要朝臣祭拜。

第三次高规格祭祀文昌的是唐僖宗。唐僖宗李僖入蜀走到广元桔柏渡，夜梦张亚子请纓杀敌、平叛，以为神助，在七曲山大庙祭祀文昌，下拜封张亚子为“济顺王”。

南宋时期，高宗下令将七曲山改为灵应



祠，并下令以王宫格局改建追封张亚子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元明时期，元仁宗封梓潼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梓潼神与文昌神合二为一，正式称为文昌帝君。

明清时期，文昌信仰发展至鼎盛，“天下学官皆建立文昌祠”，祭祀文昌。梓潼民间有了专管祭祀的会首、拜香团、文昌乐团等。清乾隆年间（1736—1795），梓潼七曲山文昌宫正门高悬“帝乡”牌匾，正式向世人宣告文昌祖庭之位，从此，文昌祭祀进入官民合祭的高潮。清咸丰年间（1851—1861），朝廷把文昌祭祀列入国家礼部祭典，梓潼七曲山大庙文昌祭祀进入鼎盛时期。

文昌祭祀分为道教祭祀、官方祭祀、民间祭祀和官民合祭四种。

道教祭祀：道教对张亚子推崇备至，自然少不了祭祀科仪。从唐宋至明清，制定有《道门科范大全集》《文昌主禄拜章道场仪》《文昌祈禄本醮》《梓潼帝君醮科》等，按仪设坛祭祀文昌。

官方祭祀：文昌虽为道教之神，但有极为浓厚的儒教色彩。从祭祀特点看，官祭倾向性很强，春、秋二祭最能体现。春祭是祭祀文昌帝君的重大祭典，在文昌生日（每年农历二月三日）举行；秋祭是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后，在梓潼逐渐兴起，每年农历八月初一举行，相传为文昌成正果之日。

民间祭祀：相对于官祭和道教祭祀，民间祭祀文昌的历史更为久远，形式和内容也更为多样化。每年两季庙会定期不变，历久不衰。

官民合祭：迎神会（又称文昌出巡、迎梓潼神等），是梓潼解放前春节重大的官民合祭文昌帝君的活动。分城乡两地朝拜，每年农历正月十二把文昌及圣父、圣母、瘟祖等从七曲山大庙迎接到梓潼县城过年，在县城文昌宫唱大

戏供奉七天，让文昌“与民同乐”，正月十八又送回大庙山供奉。数百年来已成习俗，至1950年举办最后一次迎神会为止。

文昌庙会

文昌庙会源于文昌祭祀，梓潼七曲山大庙每年有两次庙会，即农历二月初一日至十五日 and 八月初一日至十五日，是梓潼民间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大型民俗文化活动。

文昌庙会由宗教信仰开始，进而发展为民俗文化，可说是一种庙会文化。文昌春祭庙会始于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文昌秋祭庙会主祭文昌帝君化身的瘟祖，始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据《梓潼县志》记载，每年庙会之际，由会首将庙会筹备情形向知县详呈。庙会第一天



文昌庙会

早晨，各行业首事及县内各官绅，由知县领衔到大庙文昌正殿行礼如仪。第二日，由县内外举人、秀才结队前来，用8人大轿抬着文昌神像，在音乐声中巡视庙宇四周，俗称“举子祭游”。自此，县内及外州县的拜神者络绎不绝。整个庙会期间既娱神也娱人，各地川剧班子在大庙四周的天封寺、魏崇庵、青龙寺、火神

庙、永济寺、长卿山等处万年台（戏楼）唱戏，名曰“唱四方，拜诸神”。

庙会期间备有简易席桌，用二三斤猪肉混合着大量的蔬菜做成5小碟10大碗的油席，收费低廉，就食者众，前席尚未食毕，后来者已环立四周。

庙会时期，梓潼商帮及绵州、汉州、剑州、潼川（三台）、顺庆（南充）、保宁（阆中）及陕、甘南部商帮都在城内摆摊设点，划定地点，不得“侵位占行”。一季庙会的商品交易税收，往往胜过一年的农商税收。1987年以后，还多次举办“梓潼县秋季大庙商品交易会”“文昌民俗艺术节”“中华文昌文化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文昌文化交流活动”“海峡两岸文昌文化研讨会”等。

文昌出巡

文昌出巡，又叫“迎神会”“迎梓潼”，俗称“接神”，同春秋祭典一样是文昌崇拜的重要内容。是随着文昌帝君信仰而形成的一种民俗文化活动。

每到农历正月十二凌晨，县城内及周边居民都早起沐浴更衣，城内居民遍设迎神香案于自家门前，香案桌上系以红色绣花绸缎，放置香炉，左右置以蜡台，点以红烛；门首悬挂大红宫灯，门前放置新鲜嫩柏桠枝，用干柴引燃熏放烟雾。

至晨七时左右，即由城内遣派一名年轻士绅，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背背印盒，前胸挂如意，跨上骏马，经县城至上山官道，飞奔直上七曲山大庙，按预定程序与山上会首诸人接洽，恭请文昌帝君乘神轿起驾。上午九时左右，梓潼知县率领僚属、士绅等，用饰以红色呢缎的大轿，抬上主管县城阴曹地府及神鬼之事的梓潼城隍神像，在鞭炮乐奏声中，来到县城北接官厅口，恭迎文昌帝君神轿到来。圣



父、圣母、文昌和城隍四乘大轿，轿前由4个扮成宫女模样的年轻姑娘，手提香炉，内燃檀香，香气四溢；轿后，由2名扮成宫女模样姑娘执掌用孔雀、金鸡等羽毛制成，上面缀以珠翠等饰物的日月扇。每乘大轿后均有3个乐棚，有丝竹管弦组成的细乐队，多由各善堂佛学社的人组成；还有锣鼓和钹镲打击乐器组成的粗乐队，多由剧团乐队和玩友组成。锣鼓喧天，吹打弹奏，在悠扬的乐声中徐徐前进。轿队经过城中每家人户门前时，户主即率领全家人等焚香点烛、鸣炮叩首。浩荡的人群游完全城后，文昌神像就驻入县城文庙东侧的文昌行宫。

文昌迎神会当天，文昌行宫的万年台（戏楼）就开锣唱戏酬神，剧目有川剧《群仙会》等，向文昌帝君等敬贺新年。至正月十五日元宵节，俗称过大年，县城热闹异常。白天，歇驾于文昌行宫的瘟祖神像。要由数十个年轻人抬上，在锣鼓声中的人流里巡游全城各街巷，意为驱除邪恶瘟疫。入夜，有青、黄火龙出动，增添节日热闹气氛。至新年正月十八日一早，县衙官吏和会首执事们以及信众，齐集县城文昌行宫，待和尚、道士做完起程仪式之后，由事先安排好的仪仗队开道，恭送文昌帝君返回七曲山文昌宫祖庭。此种梓潼文昌出巡民俗文化活动至1950年废止。

1979年起，七曲山大庙文昌宫对外开放，恢复了七曲山传统庙会。

梓潼阳戏

梓潼阳戏是四川众多傩戏中的一个种类，同样被专家称为戏剧“活化石”。梓潼阳戏的产生，与文昌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据考察，清末民初，梓潼全县有20余个阳戏班在演出。阳戏的表演，主要由天戏、地戏、花戏等几个部份组成。梓潼阳戏自1985年发掘整理后，为中外傩学专家组织多次演出，并由绵阳市文化局录制，学术界认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1994年5月，台湾出版的由王秋桂主编的《民俗曲艺丛书》中，有四川省梓潼县马鸣乡红寨村一带的《梓潼阳戏》专书。

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解放，改革的深

入，文昌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逐步被人们所认识。中共梓潼县委、县人民政府不失时机地发展以文昌文化为内涵的文化旅游产业，充分利用博大精深的文昌文化内涵和七曲山奇秀的自然风光，以及固有的文昌经籍、洞经音乐、祭祀、庙会、出巡、春秋祭典、大新花灯、马鸣阳戏等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利用它们的多种功能和广泛的社会性，使文昌文化的物态文化层和行为文化层都成为具有很高价值的人文旅游资源，使其在发展梓潼的文化旅游产业中，更加展现出文昌文化产业所具备的历史文化、艺术观赏和科学考察等价值。

(作者单位：梓潼县地方志办公室)

稿 约

《巴蜀史志》是由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管、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地方文化刊物，双月刊。以“信史、实学、新知、美文”为追求，设有方志论坛、年鉴指导、读志用志、爱志人语、史料之窗、人物春秋、古迹考辨、史海钩沉、风物名胜、民俗风情、艺苑风采、稗史逸闻、读书随笔、域外传真等栏目。为进一步丰富内容、提升水平、服务发展，现诚挚约稿：

学术文章。应有：内容摘要(180字左右)、关键词(3-8个)；标题不超过20个字；作者简介(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参考文献按顺序列于文后，请注明详细出处。字数控制在4000字以内。

其他文稿。文责自负。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不要重复投稿。字数控制在3000字以内。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永兴巷15号21楼
邮编：610012
邮箱：bsszbjb@163.com
电话：(028)86522061

《巴蜀史志》编辑部



编者按：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近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今天，为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永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奋斗进取的价值追求，本刊特设“抗战胜利70周年”专栏，缅怀历史，追忆先辈，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痛定思痛，奋勇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进……

全面抗战时期巴中地下党的活动

□ 刘应兵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在巴中的活动逐渐恢复，呈现出“多点一极”分布状态。地下党员无论在“点”上，还是在“极”上，都自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按照党在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要求和“三勤”“三化”政策要求，采取与自身职业身份相契合的方式，从政府、学校、社会等多个层面大力推动抗战，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全面抗战。

全面抗战时期，地下党员在巴中的活动逐渐恢复，呈现出“多点一极”分布状态

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在苏区建设中发展起来的3万多名党员绝大部分跟随红军离开苏区，仅留下50余名党员，原苏区核心区域巴中的各级党组织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党员大部分在土匪、还乡团和国民党卷土重来中被血腥屠杀，个别幸存者隐姓埋名，党

在巴中的活动几乎销声匿迹。

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党中央从延安派遣了部分党员来到巴中，川东党组织也向巴中转移了部分党员，党在巴中的活动开始恢复。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交通通讯不便、组织关系隶属不同等多种原因，这些地下党员在巴中的活动呈现出“多点”分布状态。一是苟寿南在巴中县城开办“活仁药房”。苟寿南是巴中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红军入川前，他在巴中县城开办“活仁药房”，作为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红军入川后，他被当作“大地主”公开逮捕，后秘密释放，党员身份未暴露。红军撤离后，他继续利用“活仁药房”进行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二是杨正武等就职巴中县民众教育馆。1937—1938年，因“云阳暴动”失败，川东地下党云阳党组织的党员杨正武、温子伯、李英俊、张艺平（张艺萍）、温载南等相继转移到巴

中县。经推荐，杨正武担任巴中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兼巴中中学训育主任；温载南在民众馆担任总务。三是从延安回来的吴显国、张明武、毛悠勤等党员在通江县、巴中县分散活动。四是黄开富受川东地下党组织委派在平昌县江口场创办“巴阳初级中学”，就任校长。五是川东地下党员蒲正果就职平昌县江口场水文站，任站长。“四川省巴中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在江口场建立后，他兼任了农职校数学教师。六是川南地下党员万敬修回到南江县，先后担任国文教员、县政府书报室管理员、县中学校长、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等职务。

1940年，地下党员肖中鼎来到通江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通江县分会副主任。同年，部分川北地下党员转移通江，继而转移巴中县化成。他们在通江和巴中县化成的地下工作，构成了全面抗



赵济刚

战时期党在巴中活动的“一极”。

肖中鼎早年在四川军阀刘湘部任军事教官，1939年到潘文华部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上校参谋，1940年1月到通江县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分会副主任。肖中鼎的公开任务是维护地方治安、戒烟和组织“巴山防线”。共产党给他的秘密任务是，接收和掩护疏散到通南巴的地下党员，发展武装，建立革命据点。1940年，根据中共川康特委指示，郝谦、伍级生、罗洪宾等部分川北共产党员转移到通江，与肖中鼎接上关系。根据当地松树、竹子等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肖中鼎提出“发展实业，支援前线抗日救亡”口号，组织开办纸厂、制墨厂和松烟厂。在他的安排下，郝谦先在通江田赋管理处当录书，后任纸厂、制墨厂和松烟厂办事处秘书；伍级生到喜神滩、两河口等地组织

割松油和熬松烟，利用跑订货搞联络等工作。他们以办理厂务为掩护，在通江县瓦室铺、涪阳坝、马家坪等几个地方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点。

1942年初，由于罗洪宾叛变和肖中鼎调离通江县，在通江县的川北地下党员转移到巴中县化成，经肖中鼎介绍结识了党的统战人物赵济刚。在赵济刚的支持发动下，郝谦、伍级生与先来到化成的川北地下党员王叙伍、李荫谷等创建了化成中心小学。1943年，中共三台中心县委副书记王朴庵来到化成。

为积蓄力量、培养时局所需人才，化成的地下党员在赵济刚支持下创建了“巴中县私立奇章中学”。共产党掌握着这两所学校的领导权，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据点。

地下党员采取与职业身份相契合的方式，主要从政府、学校、社会三个层面推动全面

抗战

1939—1940年，毛泽东对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进行多次阐述，最终精辟地概括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194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召开一系列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六字”方针，创造性地形成了秘密党组织建设的“三勤”“三化”政策。即党员要“勤学、勤业、勤交友”；党员身份要“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或合法化）”。全面抗战时期，巴中的地下党员认真执行“十六字”方针和“三勤”“三化”政策，采取与自身职业身份相契合的方式推进全面抗战。

在政府层面，着力团结社会各界投身抗战。肖中鼎以其设计分会副主任的身份，宣讲全民族抗战大义，号召社会各界团结御辱，共赴国难。



巴中奇章初级中学



1940年初，在通江县设计分会成立会上，肖中鼎大讲抗日救亡的神圣职责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强调分会的工作和任务；同年暑假，在通江县政府教育科举办的教师讲习会上大力宣传抗日救亡。“一讲希望各党派、团体和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二讲要求后方加紧生产，支援前线；三讲‘抗战速亡’论和‘曲线救国’论之荒谬，唤醒人们不要上唯武器论的当。鼓励人们树立抗



日必胜的信心。”他支持受训学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新歌，向他们推荐进步书刊，找他们谈心，启发他们的觉悟。肖中鼎还以“发展实业、支援前线”为号召，办起纸厂、松烟厂、石墨厂，筹集抗日活动经费。

在学校层面，着力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 一是课堂教育。在奇章中学、化成中心小学、巴中中学、土地堡小学、巴阳初级中学校、四川省巴中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等，地下党员利用课堂给学生宣讲抗

战形势，教唱《大刀进行曲》《青年前进歌》《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培育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二是校园氛围营造。奇章中学和化成中心小学的校园环境布置，着力营造能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的氛围。学生寝室均以沦陷区命名，如“东北三省”“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奇章楼左边，建有陕西省地图形状的花台，插有“延安”标牌。

在社会层面，着力调动人民激情大众抗战 一是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主要有表演歌舞、演文明戏、演哑剧、演活报剧、表演魔术、发表演讲等形式。如1942年，化成中心小学师生自编了20多个剧本和曲艺节目，在仁和、南阳、寺岭、石门等地来回演出。王叙伍和他的妻子李荫谷编了很多革命歌曲，自编自唱，李荫谷经常用口琴伴奏演唱，在当地群众中流传很广。

二是印发抗日宣传小报书籍。杨正武、李雪峰组织进步学生在简师和巴中中学办了《巴中之声》和《老百姓》油印小报，登载抗日文章。《老百姓》每出一期，学生何德贵

等便到街头巷尾发放。任南江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地下党员万敬修，组织印制了抗战书籍600余册、抗日歌曲数百首，在全县范围内发放。

三是走乡串村高呼抗日口号和粉刷抗目标语。巴中中学、化成中心小学和奇章中学的学生到兰草渡、曾口、江口、鼎山、玉山、石门、凌云、南阳、寺岭、花溪、奇章坝等地，沿途高呼抗日口号，并在岩壁、民房墙壁上，用石灰水写下“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团结起来，收复失地！”“誓雪国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许多醒目的抗日宣传标语。

四是画抗日宣传漫画。化成中心小学和奇章中学教师在化成乡场上画有几副巨幅抗日宣传漫画。吴显中家墙壁上的那幅最引人注目。整个版面画的是一张中国地图，在地图上画一个红红的桃子，上写“中国”两字；侧面画着个矮矮个子、大大脑袋、细细脚杆的人张开大口，标题“自不量力”。漫画直观生动，简单易懂，群众赞不绝口。

五是做抗日宣传祭文。利用做祭文进行抗日宣传，是当时学校教师的一项创新。那时文化人少，百姓家里死了人，大多请附近学校的教师做祭文。化成中心小学和奇章中学的教师借机做抗日宣传祭文。郝谦做的一篇抗日宣传祭文流传很广。

六是联合进步人士签名、捐物和题词。苟寿南在与进步人士叶良一交往中，于1939年发动了抗日签名活动，进一步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他们组织群众募捐，支援前方抗战，动员子弟参军上前线，组织民工运输物资支援前线。提倡为抗战阵亡将士立碑纪念，由叶良一书写碑文。叶良一书法精湛，为巴中县城中心小学书写了“抗日爱国”四个大字，凡有人求字，多题赠“同胞自悟，协力御外”以勉；他题写“国家至上，民权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24个大字，刻于巴中县西城外巴河客货码头山崖上，意在激励民众觉醒和动员民众抗日。

地下党员对全面抗战的推动，对巴中人民投身抗战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

巴中地下党员从政府、学校、社会三个层面推动全面抗战，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对形成社会各界团结御侮，“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面抗战形势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处于抗战大后方的巴中人民，努力增产节约，积极捐献钱粮，支援前线；大力加强防空设施和抗战后备力量建设，在保卫后方安全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有生力量。

首先，地下党员对全面抗战的推动本身构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巴中各地抗日的口号、标语、训令等家喻

户晓，人人皆知；群众性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等抗日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不少文人志士吟诗作对，以笔代枪抒发抨击日寇的斗志。通江县春载乡名儒王松听到武汉失守时，愤怒地写道：“东洋鬼子太猖狂，胆敢横行侵我疆，大泄淫威开杀戒，恰同荼毒造祸殃，卢沟事变心坎痛，汉水流泪实可伤，只望中华神勇将，早收失地灭天狼”。1942年春节，通江县新场乡名儒过珍三在乡小学大门口书写长联：“何方能强国，想孟子策滕，管仲治齐，一则轨里连帮，一则守望相助。今保甲果雷厉风行，即是那报国良药。众志成城，效刘琨复晋，勾践事吴，时而枕戈待旦，时而卧薪尝胆，纵倭奴有枪林弹雨，难逃我无畏精神。”

其次，激起了经久持续的抗战热情，广大热血青年踊跃参军抗战。1937—1945年，通过国民政府征兵途径，巴中儿女参加抗日军队的人数达22551名，参加抗日远征军，赴缅甸、越南作战的青年有数百名之多。1942年，巴中县30余名中小學生参加抗日远征军。巴中儿女浴血疆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英勇献身，付出了重大牺牲。以通江县陈河乡为例，该乡“1936年至1943年应征国民党军队出川抗战人数为54人，在抗战中伤亡人数为31人（其中阵亡17人，失踪14人），伤亡人数占实征人数的57.41%。”

最后，促进了社会各界积极捐献抗战款物，带动了广大民众踊跃投工投劳，修筑抗战工事。全面抗战期间，抗战大后方承担了沉重的抗战费用，四川的各种税捐名目繁多，有飞机款、枪支款、航空费、国难费、劳军费、防务费、训练费、优待金、安置费、劳工费、购公债等十余种。2007年开展的“抗日战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显示，巴中在全面抗战时期，为抗战贡献的捐费、粮食和其他财产有11种，合计捐款616866.69元，粮食约98万石，军鞋4949双。由于对抗战时期捐款捐资缴粮等情况的记录不全和资料遗失等原因，实际的捐款捐资缴粮数额应当远远大于这个统计数据。全面抗战期间，巴中人民还为国民政府和军队布置“巴山防线”，修筑防空洞、避难所、防御性碉堡、营房等抗战工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如1939年6月，通江县有400余民工前往万源罗文坝修筑汉渝公路；1940年秋，巴中县龙岗乡和西兴乡100余民工前往达县修建河市机场；1943年秋，巴中县驷马乡33名民工，也前往修建达县河市机场。巴中人民为抗战胜利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史诗。

（作者单位：巴中市地方志办公室）



抗战时期什邡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及贡献

□ 党卫贵

七七事变后，全国上下全面抗战爆发，继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宣传抗日主张，掀起群众性支援抗战热潮，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独特贡献。

“一二·九”运动后，中共上级组织陆续派人到四川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各项工作。不少隐蔽在国统区坚持工作的共产党员，团结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分子，在一些地区逐步成为抗日救亡运动领导核心。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在重庆设立南方局。同年夏天，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突然事变，南方局开始筹备设立南方工作委员会和西南工作委员会，分区域就地领导，各省特委也相应划小。川西地区属西南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川康特委领导。

刘国瑞在什邡开展党的工作

刘国瑞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时，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任该校中共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北区委员会组织委员、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李寒的助手。日本占领北平以后，刘国瑞转到四川大学读书，党组织关系转到四川。1938年4月，四川大学中共地下党总支成立，刘国瑞担任组织委员。1939年，川康特委秘书长张澄文向他转达党组织安排，派他到什邡县立初级中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刘国瑞来到什邡，在什邡县立初级中学担任语文和历史课教学。他利用教学的机会，

向学生讲述八路军深入敌后抗日，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和平型关大捷等故事，批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抵抗、节节败退的时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的罪行，宣传抗日救亡，很受学生爱戴和拥护。他还组织思想进步的学生阅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马克思传》《大众哲学》《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全民抗战》《夏伯阳》《铁流》等马列主义政治理论书籍和进步文艺书刊；组织读书会，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开展交流学习体会等活动，启发、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热情，使他们逐步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对那些思想进步、有入党要求的学生，经了解无其它政治问题后，个别吸收入党。

1940年1—6月，刘国瑞先后在什邡县立初级中学的学生中分4次发展刘代合、余章鑫、廖德成、曾凡昌、陈能安、肖顺和、钟世豪等7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建立党支部之前，刘国瑞直接负责领导，分头与他们联系。1940年3—6月，刘国瑞组织什邡的全体党员在县城南门外沙包子竹林内举行了3次组织生活，学习党内文件、《新华日报》有关社论，分析校内政治动向，进行党的组织原则和保密纪律教育，向大家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开赴江北、苏北等地集中的决定，以及南方

局关于组织革命青年到延安去的指示。通过学习，加强党纪、党性教育，打好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为党的事业进一步发展培养干部，并安排几个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党员作好去延安的准备。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刘国瑞召集全体党员，传达“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并根据时局的变化，中止派党员去陕北的计划。

刘国瑞除组织党员加强自身学习，还通过学生会在校内外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



校内举办文艺晚会，逢场时到各乡（镇）作街头宣传。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抗敌后援会”“国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宣传队”“教联剧社”“师生剧团”等群众抗日救亡民间团体相继成立。他们以歌曲、话剧、川剧、曲艺、诗歌朗诵、讲演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宣传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等道理。演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流亡三部曲》《救亡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保家乡》等；演出的戏剧有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活报剧《活捉土肥原》、话剧《保卫卢沟桥》、川剧《打日本》、歌剧《夜魂》等；曲艺有金钱板《日本强盗罪滔天》《歌颂将军王铭章》、唱词《卖儿记》等。这些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歌颂了中国人民决心抗战到底的英勇气概，大大激发了什邡人民的抗日热情。

中共什邡地方党支部成立

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川康特委及时贯彻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隐蔽精干、巩固组织的方针，疏散、转移各地党的骨干，隐蔽下来的党员实行单线联系。1941年2月，刘国瑞因病被什邡县立初级中学解聘。不久，上级把他调离什邡，派往遂宁工作。

离开前，根据上级指示，刘国瑞两次召开全体党员会议，正式建立中共什邡党支部，选举廖德成任支部书记，余章鑫任宣传委员，刘代合任组织委员。1941年初，四川省教育厅下达命令，在全省各学校搜查进步书刊。毕业留校当文书的余章鑫看到命令后马上向廖德成汇报，廖立即通知党员把党的文件和进步书刊转移出学校藏在家里，躲过了学校当局的大搜查，保护了党的文件，也保护了什邡党组织。刘国瑞调走前向什邡支部的同志交待了上级党组织与他们联系的地址和接头方法、暗语等，并向川康特委秘书长张文澄汇报了建立中共什邡支部的具体情况。川康特委曾打算以此为基础恢复什邡特别支部，后因形势变化未能实现。

刘国瑞转移到遂宁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上级党组织没有与什邡支部接头。廖德成根据刘国瑞留下的联系地址——泸县大河街吉源中药房，多次写信联系，却少有回音，即使有回信，也没有谈及党组织问题。这段时期，中共什邡支部

活动逐渐减少。后来，在县立什邡初中读书的党员相继毕业或停学，离开学校或离开什邡。廖德成于1942年暑假考上收音员，前往成都受训，离开什邡。

1942年8-9月，廖德成在成都四川省收音员训练团受训时，刘国瑞曾去看他，听他汇报了什邡支部党员的情况，安排他直接同成都西门外化龙桥的刘安民同志联系，听从其工作指导。年底，廖德成受训结束，回到什邡担任民国县政府收音员，多次写信与刘安民联系，直至第二年8月才收到回信，约定在什邡南门外见面。其时，尚在什邡的党员仅有廖德成、余章鑫2人。3人相会后，刘安民听取他俩汇报，又向他俩讲述当前形势，收取了他们的党费。刘安民认为余章鑫已经带了“颜色”，一定会引起当局注意，遂派他去彭县敖家场办事，然后离开什邡到成都工作。几天之后，余章鑫赶到成都，错过约定接头时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廖德成几经辗转，多次与刘安民联系未果，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共党组织在什邡没有开展罢课、罢工等轰轰烈烈的运动和真枪实弹的武装斗争，但他们开展的一系列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得到了什邡人民的赞许和支持，在什邡历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作者单位：什邡市史志办公室）



邻水人民参与修建汉渝公路

□ 丁禹强

抗战军兴，四川成为战时后方最重要的基地，公路成为陆上唯一可以依赖的运输手段。四川人民竭尽人力、财力支援抗战，踊跃筑路，先后建成国际联络公路川滇东、川陕东（汉渝）、乐西、川滇西等2300余公里。邻水人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新建和改善汉渝公路137公里艰巨任务，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渝公路修筑概述

汉渝公路又名川陕东路，现名国道210线。以陕西汉（中）白（河）公路上的西乡县为起点，经镇巴县，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境，经万源、宣汉（双河场）、达县、大竹、邻水、江北而达重庆沙坪坝三角碑（今沙坪坝转盘），全长587公里，1942年1月竣工通车。该路是抗战时期为接运苏联及同盟国援华物资而建。

为适应国防需要，1937

年4月，四川公路局奉准令颁修正《四川公路局各县筑路委员会大纲》，四川（含今重庆）各县相继建立筑路委员会，负责协助修建国防公路。1938年2月，蒋介石电令国民政府交通部兴修汉渝公路。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发出《征集民工修筑汉渝公路实施办法》，交通部派出工程队，进行勘测。同时设立汉（中）宣（汉）、宣（汉）渝（重庆）2个工程处，由黄庆慈、孙发瑞分别担任总工程师，组织施工。9月，交通部颁发《汉渝公路工程标准》，具体指导汉渝公路的工程建设。1940年6月，因苏联援华物资减少，汉宣段奉命停工，将其工程处改组为汉渝公路工程处，总工程师由丁贡南担任。同时成立汉渝公路桥渡工程处，许行成担任总工程师。

汉渝公路四川万源至大竹

段于1939年1月开工建设，次年3月修通，竣工里程220公里。在万源城南，开凿有凉风垭、石冠寺隧道4处，各长10余米。1941年1月，达县通川大桥建成通车，是当时四川公路第一座大型钢筋混凝土多跨悬臂桥。汉渝公路大竹至重庆段于1940年1月开工建设，当年10月基本打通，竣工里程194公里。

汉渝公路历时3年，建成万源至重庆段417公里（含城区3公里），交通部耗资1209万元（不含地方各县筹集资金及民工义务工价）。因塌方严重，该路仅有达县至重庆段可以通行。以后，各地县政府多次组织民工维修。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该路逐年进行改善，1978年铺为三级沥青路面。现在的国道210线已全部实现黑化，达到一级公路标准。

汉渝公路邻水段的建设

邻水段的勘测 1939年7

月，王瓚绪发布四川省政府训令“本部公路总管理处……续组渝竹段第二测量队，派华敬熙为队长，即日率队出发测量邻水至大竹段路线，相应函请查照转饬邻水、大竹二县政府，随时予以保护及协助，以裨利进行。”交通部随即组织汉渝公路渝竹段第二测量队，向邻水县政府发出公函“查本队队址现驻大竹欧家场办公，不日因工作关系，即将迁驻贵县所辖之柑子铺。唯欧家场人口稀少，本队迁移搬运公物力夫须六十名，雇觅颇感不易。兹除函欧家场联保办公处觅妥二十名外，烦请贵县政府指定距离欧家场较近联保，令饬先期雇派力夫四十名，各自携带绳索、箩甲、扁担，俟本队迁移日期确定，再行迳函该联保转嘱来队，至各力夫。本队可以予每人国币三角之搬运费，相应函达”，进入邻水境内开展测量工作。为保障测量工作顺利进行，王瓚绪致电邻水县

县长。“准交通部梗工渝代电开：据本部汉渝公路渝竹段第二测量队队长华敬熙呈，为大竹至邻水间匪风甚炽，少数警卫难策安全，工次间亦发现枪声等情，相应转请贵府，即希电饬大竹邻水两县政府随时派队予以保护，裨利进行为荷等由，除电复并分电外，仰即派队妥为保护具报。”第二测量队也再致函邻水县政府“迳启者：本队兹以工作关系，队址于最近数日内将由观音桥迁驻张家沟，烦请贵县政府在该处附近觅妥可居五十人之房屋一所，裨便办公。再，该地方如不安谧，并请于本队到达之日起，派队相当人数前往保护。至各兵丁，本队发给伙食津贴，相应函达。至希查照办理见复为荷。”邻水县政府接获上述训令、电令及公函后，高度重视，立即部署，采取得力措施，确保测量队顺利开展工作。一是及时发出训令、指令，要求当地联保主任大力协助测量队开展工作，为其创造安全的工作条件。二是及时派出测量队附近联保的农民，自带搬运用具，前往指定地点搬运测量工具、仪器和其他生活用品。三是派出警察和国民兵团士兵前往震慑土匪，确保安

全。四是免费提供办公、住宿场所。第二测量队先后在县境普新场（与大竹欧家场共场）、柑子铺、观音桥、张家沟（今城北镇东邻村）、县城、牟家坪、合流水、坛同、

高滩场（工程处第六总段驻地）等地设立队址，负责对路面进行勘测。至12月中旬，第二测量队在县境内的测量工作结束。

民工的征集与工作 1939年12月，邻水县政府奉令征调民工万余人，开始修筑汉渝公路。从江北县茨竹乡方家沟79公里+700米处经高兴（高滩、兴隆）、坛同、合流、牟家至邻水县城，从邻水县城经菁拱（城北）、观音桥、柑子铺、普新至大竹欧家场小河160公里分界处，为邻水县筑路地段。

按照《四川公路局各县筑路委员会大纲》规定，县政府修订完善了汉渝公路邻水县筑路委员会组织领导机构，加强对筑路工程的管理力度和服务能力。1939年，邻水县筑路委员会组织机构如下：主任委员由县长王元枢兼任，总队长1人，总队附2人；财务股长、总务股长、工务股长、及各股股员各1人；第一、二、三区队队长由各区区长兼，分别管辖14、18、11个联队。



义务参与修筑汉渝公路。其中1939年12月一次性征工超过10000人，全县3个区43个乡镇联保都组织了民工集中作业，至1941年2月结束。1942年汉渝公路通车后，因路面质量差，曾分3年共派出4200余人次，协助维修路面。

邻水民工的工作主要是路基土方挖填、路面铺压、碎石捶打与运输。

按照预算，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邻水民工筑路土方奖金、代工金、补助费应收入172281元，实际收入156281元。结合《邻水县筑路委员会造具征工修筑汉渝公路收入计算书》《邻水县筑路委员会造具征工修筑汉渝公路支出计算书》《1940年5月邻水县修筑汉渝公路联队长及奖金领取名册》可以得出结论：一是对汉渝公路沿途各县下达强制性征工计划。二是参与修筑汉渝公路的邻水民工是义务劳动性质，不发工资。工程完成后，按照工作业绩发给微薄的奖金，如土方工程每公方奖金只有2角。三是邻水民工劳动工具如锄头、扁担、篾筐、绳索及生活口粮自带，用具如被盖、竹席、斗笠、蓑衣均自备。仅有铁制工具如民工的锄头、石匠的鑿子可以修理。

邻水民工对汉渝公路的维修 汉渝公路建成后，塌方严重，加之修建时受通货膨胀影响经费缺乏，路面只铺了一半，宽度仅有3米，经常断

路。邻水民间流传“一去二三里，下车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的歌谣，藉以形容汉渝公路通车初期行车难。民国时期，邻

水县政府曾3次组织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维修。

1945年，邻水县政府组织沿线15乡镇民工500余人，历20多天，维修部分路段。1946年组织沿线35乡镇3200余人再次维修。1948年2月，又组织500人进行第三次维修。邻水人民对汉渝公路倾注了特殊的感情，付出巨大的贡献。

邻水人民对汉渝公路的贡献

一是自筹资金修建邻（水）江（北）路，“经费一半来源于社会变卖，设立公产清理处为总枢，另一半加粮以资接济。”（民国《邻水县志·役政志》）征调民工2000余人分段修筑。后因军阀混战，江北县士绅不予配合，该路遂不能连通重庆，路面荆棘野草丛生，形同报废。1940年，交通部新修汉渝公路，该段路基即以邻江公路为基础，减省了很多人力和财力，最终获得实效。

二是1939年邻水民工10000余人，义务修筑汉渝公路，时间长达3个月，每人每月投工以25天计算，工时达



到75万个、挖填土方超过47万立方米。其余工具、粮食消耗和人员伤亡损失尚不计算在内。

三是1945、1946、1948年三次维修汉渝公路，出工人数达4200人，投工平均以15天计算，也在6万工时以上。

四是人员伤亡。按照1946年11月编制的《四川省各县府呈复抗战时期（民工）伤亡数目调查表》统计的平均数（伤亡人数占征用人数的5.13‰）计算，邻水民工的伤亡至少不低于70人。同时期，邻水还征调民工1000人，参与修筑白市驿机场，因瘟疫、痢疾流行，死亡77人。

抗战期间，在汉渝公路修筑、维护过程中服役的邻水民工，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汉渝公路建设便利了西部地区之间的物资、人员流通，保证了国民政府长期抗战所需的军用物资运输，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事业。

（作者单位：邻水县史志办公室）

为保卫南京而殉国的雷震将军

□ 陈学林

1937年12月，日寇犯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国民革命军展开英勇之南京保卫战，与敌殊死搏斗。是役，18位中国将军壮烈殉国，他们是：萧山令、高致嵩、罗策群、朱赤、易安华、姚中英、司徒非、李兰池、刘国用、蓝运东、万全策、雷震、谢承瑞、华品章、韩宪元、黄纪福、蔡如柏、程智。

雷震（1902—1937），原名雷汝勤，今四川省蒲江县成佳镇里仁村人。少时，先后就读邛大蒲联立中学、成都法政学校、熊克武建武学校。1924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炮兵科。1925年9月毕业，留校任军校第三期军械处中尉党代表。学习期间，他参加第一次东征、镇压滇桂军杨刘叛乱、第二次东征。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雷震被派任北伐军司令部副官。旋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蔡廷锴部之连长、营长，赴湖南作战，参加了平江之役和武汉三镇之役。收复武汉后，第二十八团编为第四军混成师一部，奔南浔路驰援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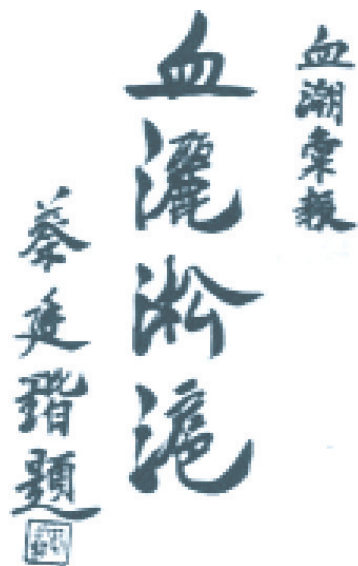
西北伐军，与敌激战马回岭、德安一线。

1927年11月，雷震奉调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教导团李仙洲部之副团长，选为教导团组织团党部执行委员，后历任军部参谋处第三科中校科长、第一军教导团第三营营长、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参谋、第一军第一师第五团副团长、第一兵站总监、第一军炮团第三营营长、上海交通大学军事训练教官。

1932年，雷震任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上校团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率部在闸北与日寇激战月余，杀敌

甚众。1933年福建事变后被解职，闲居杭州。1935年，出任中央军第七十八师桂永清部第四六八团副团长、团长。1936年，第七十八师并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雷震被任命为教导总队第二团第一营营长。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8月19日，雷震所在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二团奉统帅部令，开赴乌龙山要塞布防。经4个小时急行军到达要塞，突接总队部急令：6点钟前赶到龙潭火车站，乘列车到上海，听候张治中将军指挥。火车经奔牛镇、浒墅关，到达昆山县，一路遭敌机侦查、扫射、轰炸。20日，为避免敌机的骚扰，部队趁夜晚急行军开赴前线。21日拂晓，第二团抵达上海江湾新建市政府，隐蔽待命。此际，日寇海陆空军配合，在江湾地区多次强行登陆，战况非常惨烈，防守该地区的第十八军损失惨重。22日，第二团奉张治中将军令，“于张家浜、殷家浜、南徐家湾之线，迎击登陆敌人。”午



蔡廷锴题淞沪抗战





后两点，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寇海军舰艇，开始向第二团发动猛烈的炮击。全团官兵冒着日军炮火奋勇前进，冲过日军炮火封锁线，进入泗塘河畔；一营担任防守右翼，雷震部署：以第二连、第三连为第一线防御力量，以第一连为全营预备队。敌我双方步兵在江岸堤埂展开反复搏杀争夺。时任第一营第三连排长的刘庸诚回忆：“敌人军舰上各种火炮，空中的敌机和少数占领江岸桥头堡的步兵，密如暴雨一般的炮弹、机枪和步枪弹不断地向我们泼来，立即泥浆冲天，硝烟弥漫，有如黄昏。”在第二团顽强阻击下，日军久留米师团登陆的步兵，不敢蠢动。张华浜阻击战中，第二团官兵伤亡近半数。11月6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进驻苏州河畔八字桥阵地，接替第七十一军第六十七师黄维部之防务，桂永清要求教导总队死守阵地。教导

总队全军将士与敌连续血战四天。11日，金山卫被日军突破，教导总队奉命撤回南京。

1937年11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扩编为三旅六团制，雷震升任第三旅上校副旅长。同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中国军队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教导总队奉命直接撤到湖南，应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请求，经蒋介石同意留守南京。

卫戍司令部给教导总队下达的作战命令是：以协同友军同守南京为目的，于工兵学校、西山、紫金山、岔路口、中山门、太平门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加强防御工事，阻击歼灭沿京杭公路来犯之敌。

12月7日晚上，日军便衣队穿第八十七师军衣，袭击教导总队骑兵团第一营阵地，占领汤山。总队部命令骑兵团青龙山一线极力阻敌前进，下令

各队禁止第八十七师士兵经过阵地，以防敌人的偷袭。第一旅旅长周振强、第三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团长杨厚灿联名向唐生智、桂永清建议：集中兵力由紫金山的岔路口地区出击，威胁敌人后方。唐桂二将军认为“现在消耗兵员太多，万一出击不成，守南京的兵力就更不够了。”没有同意。8日拂晓，日军大批敌机向紫金山阵地轰炸，炮兵集中火力向麒麟门前进阵地射击，先遣装甲部队突进到通济门外红毛山附近，步兵开始向教导总队阵地攻击。当日，麒麟门前进阵地失守。9日拂晓，日寇集中兵力，攻击紫金山老虎洞阵地，教导总队且战且退，撤至紫金山第二峰主阵地防守。10日拂晓，日军集中兵力，进攻紫金山第二峰、孝陵卫之西山主阵地。周振强回忆道：“教导总队在孝陵卫驻扎四年之久，地形熟悉，构筑的阵地也比较坚固，官兵工战，由10日至11日晚上，在第二峰和



紫金山上教导总队坚守的阵地残骸

西山同敌人反复的争夺战中，我队虽伤亡很大，同时也杀伤敌人很多，阵地始终在我队手中。”12日下午3时，首都卫戍司令部颁布卫戍作战命特字第一号命令：教导总队自紫金山北麓、麒麟门、土桥镇、天王寺以南地区向敌突围，向昌化附近集结。唐生智给教导总队下达口头指示：“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洲集结”。至夜，教导总队前线官兵没接到弃城撤退的命令，仍在紫金山、灵谷寺、陵园新村、西山孝陵卫、白骨坟一线与敌激战。晚10时，第八十八师防守的雨花台阵地失守，粤军邓龙光部撤出太平门，教导总队前线阵地官兵与总指挥部失去联系。部分官兵商议决定：第三旅同粤军邓龙光部一起突围；工兵团到下头煤炭港、燕子矶之间准备渡河器材，骑兵团占领煤炭港一线掩护撤退；第一旅第一团为后卫。晚12时，教导总队开始逐次由阵地撤退，留一部占领紫金山的天堡城为掩护阵地，其余部队向煤炭港、燕子矶之间方向撤退。刘庸诚回忆说：“紫金山上马威龙的两个团，由于接不到命令，仍在苦战中。”“很多部队开始突围或向下关撤退时，固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第三旅还在旅长马威龙率领下与日军死战。直到13日零点以后才开始撤退。”13日中午，敌



南京保卫战示意图

舰突破乌龙山长江封锁线，控制下关江面。下午，第三旅副旅长雷震带军过江突围未果，决定于下关火车站掩护军民乘火车突围。他率连长雷天乙等官兵上火车最后一节车厢殿后，列车被日机空袭炸断，火车头拉着前面车厢开走。雷震下车指挥官兵抗击蜂拥而至之日军近卫师团，与敌血战，终阵亡殉国，时年35岁。

1938年6月8日，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呈请国民政府给恤褒奖。9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追赠雷震为少将。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向雷震之父雷德森、母王氏、妻朱雅雲、妻刘云祯、子雷克明、女雷克兰、女雷煜煜，下达恤金给与令，发遗属一次抚恤金

1500元，年抚金600元。1939年，蒲江文庙设抗日战争殉国烈士“忠烈祠”，以每年3月29日为祭祀忠烈之日期，雷震入祀。1986年11月25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雷震为革命烈士。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雷震烈士的英名被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之历史丰碑。

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至1937年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雷震将军始终冲锋在与日寇搏杀的最前线。他勇往直前，不惧生死，为民族之解放战斗到最后一刻，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抗日英雄。

（作者单位：成都市蒲江县史志办公室）



编者按：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红军在四川的一年八个月，是惊天动地的长征史诗中光辉篇章。今年是红军长征入川80周年，本刊特设“红军长征在四川”专栏，回顾和纪念那段雄浑激越、磅礴恢弘的动人诗章。

老红军文荣德长征回忆*

□ 石京秀

文荣德，男，1917年10月出生，汉族，四川苍溪人，中共党员，1933年12月参加红军。他先后参加了川陕根据地的反六路围攻万源保卫战，强渡嘉陵江战役；1935年6月，随所属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后掉头南下，参加了百丈关战役；南下计划受挫后，他又跟随部队再次北上，长征至陕北。之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投身革命的历史背景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在打退敌人第三次围剿后，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经鄂北、豫西西进，1932年12月乘四川军阀混战及其在川北兵力薄弱之机，红军进军

川北形成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在与川军作战中，川陕根据地取得辉煌战果并向四周扩大、巩固，这也包括文荣德的家乡。文荣德家在四川广元苍溪县中土镇板庙村，贫苦农民家庭出身。他说：“1933年秋，红军解放了我的家乡，在同学文伯宗的介绍下，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被指定为苏维埃少先队队长，随即被调往县委开办的新党员训练班。受训期未满就遭到国民党军队进攻，当时为了收紧阵地，于是跟随县委北撤，撤至李子垭时，地方政权人员大部分都战斗化编入部队。县委号召学员参军，在红军革命精神鼓励下，我于1933年12月报名参加了红



文荣德的“百宝箱”里装满了他的军功章

军，分配到红30军276团1连当战士，我们村有20多人参加了红军。”文荣德所在的村子有较高比例村民热血激情参加红军，说明红军在当地积极发动了群众，与文献描述的红军发展壮大趋势吻合。

文荣德说：“我们文家大院包括我在内，5个人一起参加革命，那4位都牺牲了，其中我堂哥在红军离开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堂哥的遭遇使我坚定了誓死跟着红军走到底的决心。”民政部中华英

*2013年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立项项目SLQ2013B-04

烈网，文荣德家乡苍溪县在册的“文姓”红军烈士有46位，其中应该包括文荣德的亲属。文荣德的回忆反映了在红军队伍扩大的同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投身革命牺牲的概率很大，也证实了红军撤离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参加革命的干部、群众及红军家属进行了血腥的杀戮。

亲历万源保卫战

文荣德参加红军时正值反六路围攻开始，他说：“我因为年轻而灵活，有点文化，担任了侦察兵，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敌人发现，后撤时中弹，是一起执行侦察任务的另两名战友用3天时间用担架把我抬进镇龙关红军医院，后又转入后方医院。给我做手术的医生讲，由于国民党兵使用的枪支膛线已基本磨平，子弹劲力不够，没有穿胸而过，否则我早就见马克思去了。伤愈后我原部队离开了，我被编入红9军，担任红9军73团通讯连战士，并很快继续投入战斗。”

1934年7月，敌人开始了以万源为主要目标的全力猛攻，万源保卫战是其中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文荣德讲：“反‘六路围攻’打了10个月，万源保卫战是其中最后一仗，我们打赢了，把川军赶出几百公里以外。由于战局瞬息万变，为了及时把首长的指挥命令传达到一线战场，我冒着枪林弹雨不停地在各个山头之间穿梭，爬行于腐烂的尸体间，在汗水长时间的浸泡下，

在不断奔跑的摩擦下，我大腿内侧大面积溃烂、感染。但我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结束，才住进了王坪红军医院，用草药治的伤。”包括万源保卫战在内的红四方面

军反“六路围攻”，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文荣德所在红9军73团得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嘉奖：“分别授予九军七十三团以‘攻如猛虎’、七十五团以‘守如泰山’的奖旗。”

嘉陵江战役担任通信兵

文荣德说：“第二次伤愈返回部队途中，我被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截住，编入总参交通7队，后来又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31军军长王树声的通信连。”

1935年3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国民党聚集重兵沿嘉陵江西岸严密布防。徐向前沿东岸勘查200公里，选定苍溪塔子山附近作为主要突破口。3月28日各军先头部队从几个突破口分别迅疾强攻，击退守敌强渡成功，之后红四方面军全部成功渡江，席卷沿江川军，巩固了防线。

文荣德自豪地说“我在王树声通信连当战士，随首长行动，负责首长安全，传送文件，关键时刻还要投入战斗。



嘉陵江战役沿线很长，历时20多天，我们通信兵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及时将徐向前、王树声的命令传达到各部。我在嘉陵江两岸往返十余趟，若干年后首长们还记得我的名字，夸我是子弹都躲着我走的传奇通信员。”

参加百丈关大决战

百丈位于雅安与成都的交通线之间，1935年11月18日之前红军挺进百丈关十分顺利，之后战局迅速发生逆转。11月19日拂晓，敌军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军发起进攻，揭开了大决战的序幕。激战7昼夜，红军毙伤敌人1.5万，自己伤亡1万，最后撤退结束战斗，这是红军从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文荣德分析百丈关之战失败的原因：“之前我们总是压着川军打，所以事先有点轻敌，百丈地区地势开阔，都是水田，红军擅长山地作战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敌人补充兵力、武器很方便，我们却没有稳定的补给。”



文荣德回忆：“我随王树声进入百丈镇时，整条街已是火光冲天，百丈阵地一次又一次被敌人突破，战况对我们不利。”这是一场事关红四方面军未来走向的关键之战，高级指挥员王树声亲临战场了解战况，并看到了红军艰难、被动的局面，红军原本机动灵活的战术变成了拼消耗的拉锯战。

长征记忆

谈放弃川陕根据地的原因 1935年4月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西进，从此开始长征。文荣德分析“由于长期战争，人都跑了，没有人种地，田地荒芜，商业凋谢，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已经不能养活红军这么多人了。”

有时被迫留下重伤病员 文荣德难过地说起长征中安置重伤员的情况：“离开根据地后，有时不得已，就把重伤病员抬到庙里，留下4块大洋，希望遇到好心人帮助。”现在万源地区就有红军医院遗址，印证了在川陕根据地时期有红军医院，文荣德就提到他住过的“镇龙关红军医院”“后方

医院”“王坪红军医院”，有的医院还可手术，加上中草药，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伤员。

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是到陕北才认清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红四方面军又南返，有军史文献记载“红军合而又分，一部北上、一部南下的事实，使广大指战员迷惑不解，垂头丧气，难以打起精神。”

对此文荣德说：“第二次过草地的确比第一次更艰苦，但说红四方面军南返时广大指战员‘迷惑不解’‘垂头丧气’，此话不准确。在当时只有团级以上干部，特别是如许世友那种级别的高级干部才知道发生在红军高层的政治斗争，党内斗争是保密的，干部有保密纪律约束，团级以下的广大官兵全然不知。尽管翻雪山、过草地曲折往返艰辛多，我们还以为是战略需要，战士们祖祖辈辈都是大山里的农民，文化低，哪里懂张国焘的分离主义路线？一切听从上级指挥，在打到‘成都吃大米’美好前景展示下，我们充满信心地边走边唱《红军南下行》：红军南下行，要打到成都，消灭薛岳、李抱冰……我们对张国焘个人的野心膨胀，有枪便成草头王的军阀思想，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是长征到了陕北后才了解，并都站到了中央的立场上来。”

考证红四方面军史料，因说错话而被肃反事件多次发生，因此红军干部、战士不大可能随便议论敏感话题；从红四方面军南下，在两过草地未得到休整的情况下取得了绥崇丹懋战役的首战胜利，也说明红军官兵士气高昂、斗志旺盛。

再次北上 百丈关红军受到强敌阻挡，标志着张国焘南下计划失败，红四方面军不得不再次北上。文荣德说：“在被迫撤至九顶山、蒙顶山与敌人对峙的两个月，我们31军军部住在雅安地区一个叫石桥的小镇上一个地主家里，短暂的休整期，却是我个人红军生涯少有的轻松的时期。当地物产比较富裕，我们砍掉蒙顶山上地主的茶树，连叶子也熬成茶块，每人保存一些；把牛肉做成牛肉干，剥棕皮扎成棕垫，为防潮防寒做准备。转移时连长、指导员的马用来驮粮食，才使我们再爬雪山、过草地时有点维持生命的食物储备。”蒙顶山建有《蒙山红军纪念馆》，证明这里曾经有红军活动的历史事实，山上茶树等林木茂盛，盛产茶叶，并小有名气，这些都与文荣德讲述形成互证。

长征途中忍饥挨饿是常事，文荣德对偶尔遇到的美餐记忆犹新：“过了草地到了甘肅的哈达铺，正是西瓜成熟季节，我们这些四川来的山里娃第一次看见西瓜，司务长收来连西瓜皮一起煮着给大家当饭



红军百丈关战役纪念馆

吃。”

目睹较多中央红军的遗体 文荣德说：“我们部队有专门的人负责掩埋牺牲的战友，一场战斗结束，在前线牺牲的红军遗体也要抢回来掩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尊重烈士，让官兵们感到即使战死沙场也不抛尸野外，符合‘入土为安’的民俗，显得人性化，以提高部队士气。”

“1935年9、10月，在过草地、爬雪山南返的路上，见到三四个前中央红军北上时倒在草地、夹金山上的很多红军的遗体”。由于从瑞金出发近1年，一路征战，官兵们疲惫不堪，体质普遍较弱，伤病员多。正如文荣德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战士显得身强力壮，而中央红军战士面黄肌瘦，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因此，可以理解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中央红军对牺牲在路上的战友，因自身极度虚弱没有力气去掩埋。”

同班的战友被肃反 白雀园“大肃反”发生的时间是1931年。文荣德说：“我记忆中我们部队里，凡是有点文化的、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后来都不见人了，被肃掉了。我亲眼看到我们班长用刀杀死一位战友，罪名是：有次他议论白军，语言上同情了对方，被怀疑成那边派来的特务。我虽然有点文化，却是贫穷家庭出生，加上性格沉稳，话少，没有担心被肃反的顾虑。听说红

9军肃反的比较少，因为9军在组建的时候是专门挑选身体好的和出生贫穷家庭的人”。说明红四方面军的肃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陆续发生，知识分子和思维、语言活跃的同志被肃反的多。

分析红军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讲述西路军历史背景 文荣德说：“红军会师后，陕甘宁地区一下子增加了几万红军，而那里生产力低下，很难长期承载这么多人，军队征粮困难，红军向外发展是迟早的事情。陕甘宁根据地的北边是沙漠，东边是阎锡山长期盘踞的山西，很难打下，南边是胡宗南的中央军也是强敌，分析当时周边情况，红军只好西进。”文荣德根据所闻所见的分析也是对中央制定宁夏计划必然性的论证。

分析西路军失败原因 西进的红军包括30军、9军，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称为西路军。首先执行宁夏计划的是红军30军。1936年10月25日红30军263团突破黄河天险，后续部队抢渡摧毁马家军防线。西路军刚开始锐不可挡，取得一定的战绩，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在河西走廊孤军奋战4个月后最终失败。西路军渡河时红军总数2.18万，惨败后损失严重，只有少数经营救或自己突围回到延安。

文荣德曾经是30军、9军的战士。他曾两次受伤，是战友舍生忘死地救了他，长征时他“还在路上碰见曾背我的

30军和9军的战友们，后来在延安就不见这些曾经熟悉的战友”，他对西路军的战友们折戟于戈壁沙漠十分心痛。

文荣德从亲身经历谈了西路军失败原因。他惋惜：“当晚我们31军等部队已经到了黄河边，由于太晚就没有及时渡河，如果我们31军、4军头一天夜间抢渡黄河，西路军不会全军覆没。结果第二天对岸码头被胡宗南部占领，河东我们这边也受到敌人猛烈冲击，我们军政委又急又气，与司令部的人员一起用手枪、步枪打飞机。地面的敌人也凶猛，红4军与敌人激战时，我方有一个阵地被突破，险些被歼灭，情况十分危急，部队差点被打乱，后来我31军一个团顶上去，局面才得以控制。本来朱德等红军领导是准备按计划一起西进执行宁夏计划，如果我们都过去了，西进红军的整体力量强了，肯定能战胜马家军，而且领导力量加强就可以避免陈昌浩在西路军指挥问题上优柔寡断的错误。31军等部队西渡黄河失败就一直没有西渡黄河去补充西路军。”

文荣德认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很简单：“正准备渡河的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的红军被突如其来的敌人隔断了。”这与军史记载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相同：没有援军。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1935年5月至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进入甘孜藏区，在泸定、康定、丹巴、道孚、乾宁（1978年撤县）、炉霍、甘孜、瞻化（今新龙）、雅江、理化（今理塘）、稻城、定乡（今乡城）、得荣、巴安（今巴塘）、白玉、色达等16个县经过和停驻，休整近15个月。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的活动时间之长、区域之广，在整个红军长征中都是少有的。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惊天地、泣鬼神，中外闻名；著名的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最光辉的历史篇章之一。

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帮助甘孜藏族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波巴（藏族）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进行了一次成功实践。波巴政府为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做出过重大贡献，其历史功绩将永垂青史。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50年指出，甘孜藏区人民“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

红军长征经过甘孜藏区，在党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路线指引下，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大力开展民族、宗教、统战工作，探索制定了一系列适合甘孜藏区实际的具体方针和政策，广泛团结、争取了藏族各界各阶层人士，在藏

党的民族政策 在甘孜藏区的成功实践

□ 韩广富

族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有效地保存了红军力量，使红军顺利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红军在甘孜藏区所实行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是成功的，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党在红军长征前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般原理，提出了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一系列主张。

中国少数民族的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的组成部分。只有

经过民主革命，驱逐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使少数民族获得完全的解放，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自治。

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即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

中国各民族不分大小，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坚决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倾向。

党和苏维埃政府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注意培养和选拔使用本民族干部以管理本民族事务；注意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帮助其发展经济和文化；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允许在一切政府机关中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发展民族语文教育，设立民族语言编辑馆和印刷局。

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绝对实行政教分立的原则。

红军在甘孜藏区与寺庙、土司签订的条约、协定

为了在甘孜藏区建立巩固的反蒋统一战线，筹备波巴中央政府，推动川康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36年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了《互助条约》。阐述了红军与波巴联合的政治基础，指出“兴番灭蒋是中国红军与卜（波）巴民族共同的责任”，要“大大宣传兴番灭蒋的政策及

红军帮助卜(波)巴”;红军帮助建立“卜(波)巴人民共和国”“参照卜巴原来习惯建立甘孜卜巴政府”“为了加强政府力量须参加一批勇敢坚决为卜巴奋斗的人民及青年到政府中”;并商定“准备最近召集康藏番民代表大会成立中央政府完全脱离蒋介石汉官的统治”“喇嘛寺负责供给红军粮食和一部分物资资财”“喇嘛寺负责最近召回所有逃到外边的未回来的人民群众及牛羊牲口财物回来安居乐业,红军一定保护”;“红军与卜巴及喇嘛联合到底,如发生争执和不合(和)问题时双方协商解决。”这一条约不仅是红军与寺庙之间的协议,实质上更是甘孜县政教势力与红军达成的政治协议,标志着康北(即甘孜州北部)以“兴番灭蒋”为政治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互助条约》签订后,在甘孜成立了以孔萨土司德钦翁

(旺)姆为委员长的12人组成的波巴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开始了波巴中央政府的筹备工作。

1936年4月22日,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德格土司军事涅巴夏克刀登代表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德格土司停止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土司武装退回辖区内,红军亦不西进土司辖区;德格土司支援红军一部分粮食和物资;双方赞同“兴番灭蒋”,在红军帮助下建立波巴人民共和国等。该《协定》不仅解除了康北西部最强大的土司武装对红军的军事威胁,金沙江以西之西藏地方政府的藏军也难以越过土司辖区进攻红军;康区各大小寺庙、土司头人风闻实力雄厚的德格甲布(德格王)已与红军合作,也不再采取对抗行动。从此,康区土司、寺庙在国民党欺骗煽动下对红军的军事对抗基本结束,损失惨重、疲惫不堪的红军部队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赢得了补充休整的宝贵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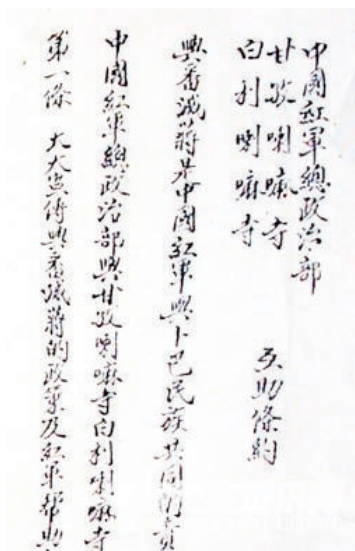
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的《互助条约》,与德格土司签订的《互不侵犯协定》,为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3—4月,红军先后帮助藏族人民建立泰宁(原甘孜州乾宁县,1978年撤县)、道孚、

炉霍、甘孜、雅江、瞻化(今新龙)6个县级波巴政府。同时,以孔萨土司德钦翁姆为委员长、白利土司贡布泽登为副委员长、甘孜寺香根活佛为秘书长的波巴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联名12人组成卜巴人民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告示、传单,四处宣传,积极筹建波巴中央政府。通过波巴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努力,党和红军抗日反蒋的主张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保护寺庙等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到甘孜藏区的各个村寨、牧场、寺院,为波巴中央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6年5月1日,来自德格、甘孜、炉霍、道孚、泰宁、瞻化、白玉、邓柯(原甘孜州邓柯县,1978年撤县)、石渠、同普(今属西藏昌都市江达县)、雅江、大小金川(今阿坝州金川县、小金县)的700余名代表齐聚甘孜县城,参加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月5日大会通过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选举出以多德为主席,德钦翁姆·达吉为副主席的波巴中央政府,并宣布了波巴政府的10条政纲。

《宣言》指出:“蒋介石更是变本加厉引进英日侵略者,不但出卖满州,还要出卖康藏”,提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兴番灭蒋”,号召波巴人民





“一致奋斗，为解除过去的痛苦”，“不分教别，不分区域族别，不分僧俗贵贱，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一条心地去干这番为我们全体波巴人民永远过好日子的大事”。大会决定与抗日红军“订立永远的盟好”。

波巴中央政府驻甘孜县城孔萨土司官寨。下设民政、农业、畜牧、军事、外交、司法、民族、财政、宗教等9个部，每部设有正副部长各1人，另设中央政治检查处。为了帮助和领导波巴中央政府的工作，党和红军派遣中共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担任党代表，刘绍文任顾问。

波巴中央政府成立后宣布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为其成员国，实践了党帮助少数民族独立解放，以联邦制形式贯彻民族自治的主张，这是我党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早期的主张。

波巴中央政府从组成人员

上看，是以藏族僧俗上层人士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波巴政府，但其组建较完整地贯彻了党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实现了红军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及各阶层在抗日反帝反蒋基础上的联合，实现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民族自治，使康北成为新型的革命根据地，并呈现出稳定、团结、生机勃勃的局面。

波巴政府的历史地位

波巴政府的建立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胜利。波巴政府广泛接纳了赞成与红军联合“兴番灭蒋”政治纲领的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地实现了中华民族内部各阶级和各民族之间在抗日基础上的联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还处于启动阶段，远离全国政治斗争中心的甘孜藏区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实行民族

压迫制度，社会动荡，民族矛盾较为突出。红军提出“兴番灭蒋”政策，实现了红军与藏族各阶层人民的联合，建立了政治上军事上的联盟，实现了康北社会的相对稳定，有效地保存了红军实力，使红军在转战康区期间积蓄了力量，顺利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

波巴政府的建立是党的民族自治主张较早和较为成功的实践。各级波巴政府领导职务绝大部分由藏族担任，其中有不少民族、宗教界人士，他们有一定文化知识、履职能力，也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在波巴政府中有职有权，从而较好地体现了民族自治权利，使藏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

各级波巴政府都较好地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了藏、汉、回各民族的衷心拥护。在波巴中央政府政纲中明确宣布境内藏、汉、回各民族非番族群众在赞同“兴番灭蒋”，遵守波巴政府各项法令的前提下一律享有平等权利，可以派代表参加波巴政府及组织自治区，并在汉族居民较多的一些县城成立汉人自治委员会；禁止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不准称藏族同胞为“蛮子”；提倡学习使用藏文藏语，波巴政府文告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等。在道孚县波巴政府颁布的《关于喇嘛和喇嘛寺

暂行条例》中则较为详尽地列出了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有关规定，这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是最早的较为完备的宗教政策文献，表明红军充分认识到了宗教在藏区社会中的特殊影响及处理好宗教问题对团结藏族各阶层人民的重要意义。

波巴政府对红军的巨大支援。红军和波巴政府建立了政治、军事上的联盟之后，各级波巴政府都竭尽全力支援红军，使遭受重创后的红四方面军获得补充和休整。如筹集大量粮食、牛羊、食盐、羊毛、皮张支援红军；组建自卫军、游击队站岗放哨，乃至配合红军作战，多次击溃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土司武装的袭击；派出大批通司（翻译）、向导为红军翻译和带路，一大批藏族青年参加红军，壮大红军力量；红军北上后，各级波巴政府成员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转移大批红军伤病员。据统计，留在康北的红军伤病员总计3800余人，其中大多数被群众转移或安置掩护，仅波巴中央政府成员直接安排救护的就达200余人。许多波巴政府成员和支援过红军的藏族群众在白色恐怖下遭受残酷迫害，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波巴政府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提出的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纲领，基本是符合马列主义关于

民族问题基本原则的，如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自治、民族团结等。同时，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民族纲领政策受前苏联模式影响，对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又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问题有一个认识过程，倾向于以“联邦制”形式实现民族自决。而“联邦制”是从反对当时军阀割据提出来的，过分强调承认民族自决权要“彻底”和“无条件”。“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及其隶属的波巴人民共和国、格勒得沙共和国的建立就是对这种不成熟纲领的机械实践。“联邦制”建立独立国家的主张都违反了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波巴人民共和国政纲没有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波巴人民居住的地域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却过分宣扬“波巴独立”，为波巴“独立自由”奋斗，建立“波巴独立军”等，这些都有重大局限性。“联邦制”是国家体制问题，民族、宗教政策是国内具体政策，这是不能混淆的。

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民族区域自治”道路，摒弃了“联邦制”主张。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基本方针中明确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于1947年5月1日首先建立了内蒙古自治

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后来，民族区域自治又明确载入历次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新中国历次颁布的宪法都庄严地以根本大法形式规定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平等团结在国家制度上的体现，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结合，是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有利于实现统一和自治即集中制与分权制的恰当结合，有利于国家大政方针与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的结合，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与民族地区具体利益的结合，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截至目前，中国已培养近300万名少数民族干部，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盟）、120个自治县（旗）。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政府，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任何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言行。

（作者单位：甘孜州地方志办公室）



红军长征在阿坝的主要战事

□ 尼美

1935年春至1936年夏，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经艰苦转战先后进入川西北地区（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阿坝地区16个月的时间里，红军领导各族人民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阿坝各族儿女为支援红军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红军在阿坝地区战胜雪山草地，浴血奋战一年多，谱写了党史和人民军队史上的壮丽篇章，开创了中共在阿坝地区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

土门战役

1935年，红四方面军西进川西北，4月下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与二十九军孙震部构筑工事扼守北川河谷。邓锡侯任命二十八军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三旅旅长陶凯为松、理、茂、汶屯区“剿匪”指挥；五旅旅长黄绍猷为副指挥，调8

个团在土门、北川河谷布防。陶凯沿片口场、青片河、土门河、何家沟至西大垭口设第一道封锁线；屯区“剿匪”司令张瑞图率屯殖军团、松潘和茂县地方团队、土兵、北川县民防团及二十八军十五旅三十团防守赤土坡、七星包，过土门河至观音梁子为第二道防线；二十八军第三、十五、十九、二十六团及十团第二营、二十五团第三营防守土地岭；水茶店一线由二十八军第七团、十团驻守为第三道防线。屯殖军马队在干沟附近。国民党军总兵力1万余。

4月底，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于漩坪击溃孙本部李炜如旅攻占伏泉山，红八十九师又击溃陶凯旅占领墩上。5月11日，红九军、三十军主力击溃十五旅攻占大垭口。国民党军孙部第二纵队司令王铭章指挥第八、九、十二旅9个团由擂

鼓坪向北川河北岸攻击；邓部第一师师长陈鼎勋指挥二、三、十二、十四、十五旅14个团由茶坪向北川、墩上攻击。红九军、三十军在垭口白家林重创由茶坪进攻的敌军，迫其退守茶坪。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和九军第二十五师各一部攻占千佛山主峰佛祖庙。红九军、三十军出大垭口西进，攻占佛字顶，在敌主阵地左翼包抄，激战4小时夺得观音梁子高地，直取土门雨淋磴。红三十军一部抄出大沟口与右翼红军包围全歼陶凯指挥部4个营，占领土门和土地岭。红军占领茂县县城。红军在土门战役吸引国民党军20个师、44个旅、86个团，总兵力15万人，歼敌1万余人。

松潘战役

1935年6月29日，根据中央《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向甘南发展，但战役计划未能

如期进行而被迫中止，其间主要战斗有：

塔子山战斗 6月，李文旅在北距松潘县城1公里塔子山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激战。拂晓前，红军向塔子山阵地发起进攻，夺取制高点，歼李文部1个机枪连。李文以1个营组成敢死队向山顶轮番强攻。红军占制高点后，无后续增援南撤。此战红军击毙李文部营长以下官兵300余人。

毛儿盖战斗 入草地绕攻松潘失利后，毛儿盖成为红军出甘南途径。7月初胡宗南部廖昂补充旅一团一营营长李日基率部抵毛儿盖索花寺阵地，红一军团和三十军拔除李营外围3个警戒哨，夜间向其阵地进攻。李营拒守，红军攻未克，包围之。7月中旬，李营守寺副营长和一连长被红军击毙，李营乘夜突围。红军俘敌百人。红一军团侦察连和三十军二六八团两个连全歼李营残部于腊子山以西25公里处，俘敌400余。红军占领毛儿盖，向松潘挺进。此战同时，红四军由红土坡、小姓沟向胡部丁德隆旅发起猛攻，进至牟尼沟，丁旅退守牟尼沟左岸。岷江东岸，红军由镇坪向北进攻，与踞金全瓶岩胡部李文旅六团交火。李旅四、五团由镇江关增援，被红军击毙团长1人、营长2人，溃退。红军追击，北定关再创李铁军旅二

团，伤团长1人，毙多人，敌收缩阵地据碉死守。

龙日坝战斗 7月初，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五团三营和无线电二十一分队从康猫寺出发探路。下午4时许，红军六团在龙日坝附近与杨俊扎西一千余土骑兵遭遇。红六团以二营掩护，一、三营抢占东西面山坡，土骑兵发起冲锋，阵地多次被骑兵冲入，激战5小时，红六团主力南撤。团政委负重伤。伤亡指战员400余人。

夏洮战役

1935年7月，中央军委在毛儿盖附近召开会议放弃攻打松潘，采纳张国焘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行动意见；8月3日，颁布《夏洮战役计划》，攻占阿坝，北进夏河，向东迫进，左路军向卓克基集结。红军一纵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为先头团，占领大藏寺向阿坝前进。左路军主力一纵队向阿坝进发。红三十军九十三师由康猫寺经龙日坝向阿坝进发，其先头部队与阿坝土官杨俊扎西骑兵遭遇失利后撤，后继部队击溃土骑兵。红九军二十五师和红五军从马尔康大藏寺出发，在四寨与九十三师会合，二十五师击溃狙击土兵占领查理寺后，红军占领阿坝。8月，红军先头部队占领班佑。红一、三、四、三十军和军委纵队一部及红军大学组成

右路军在前指率领下开展包座战斗。

包座为胡宗南粮运、军需连接甘松故道要冲，胡部廖昂补充旅二团三营驻守包座河东岸达戒寺，张俊耀游击二支队驻包座西北约90公里的阿西茸和包座7房、若尔盖12部落土兵巡防警戒班佑护粮秣道路。胡增派补充二团主力驻上、下包座，派补充二团二营五连驻阿西茸，张俊耀部驻巴西。

红军右路军三十军抵班佑，击溃若尔盖12部落1000余土兵占领班佑，击溃张俊耀支队和部分土兵占巴西上藏寺、牙弄寨等地。再溃张俊耀支队和补二团五连，攻占阿西茸，将敌军围于卓藏寺高地碉堡内。

胡宗南令伍诚仁四十九师由漳腊向上下包座、阿西茸增援。红四军十师向求吉寺进攻未奏效，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进攻达戒寺守军，克寺北碉堡，又由寺院西侧突入寺中。激战一夜歼寺院守军一连余。8月底，胡宗南令李铁军一旅增援包座。

伍诚仁师二九一团到达戒寺以南地带与红三十军警戒部队接触，红军后撤至达戒寺东北山地隐蔽，诱其深入。伍师二九四团和包座河西岸二九一团附二九四团三营夹河并进。红二六六团在河西岸正面迎击，诱其进入伏击地区；红三





十军随即出击，二六六团南北夹击，毙其少校团副1人，营长3人，全歼4个营。红军集中兵力将伍师二八九团压缩于河西岸小山头，至夜全歼。河东岸，红二六四团和二六八团、二六六团各一部向伍师师部及其二九四团进攻，歼其大部。伍诚仁负伤率残部溃逃。上包座战斗结束，毙伤胡部伍师官兵4000余人，俘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和电台、粮食、牛羊等军需物资。

右路军包座战斗后，红一军9月初由巴西、阿西茸北进甘南。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命令，夏洮战役被迫中止。

绥崇丹懋战役

1935年9月，张国焘反对北上，15日，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颁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0月初，由阿坝和巴西南下红军集结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党坝准备向南进攻。

10月7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纵队和左侧支

队。右纵队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向观音河西岸刘文辉部两个连及1000余绰斯甲土兵发起攻击。刘部砍断铁索桥，于西岸构筑工事。红七十四团在观音桥麦斯卡乘船强渡未果，于上游毖多寺乘夜偷渡成功。刘部溃逃，红军进占周山。

战役开始，总部令左纵队红四军西渡大金川，沿西岸夺取绥靖、丹巴。三十军由大金川东岸攻取崇化转取懋功。二十七师向两河口、达维进击。红军10月初在党坝夜渡大金川。党坝对岸有敌两个营和绥靖地方武装及寨兵近2000人防守。红四军于党坝下游海螺台子将扎有草人、挂有马灯的木筏推入河中，吸引敌军火力，另一部在党坝麻壤乘7只船西渡成功，击溃敌守军。红军占领绥靖后攻占独松。突破敌军1个团狙击占领南街，夺取丹巴城。红三十军沿大金川南岸进击，在得胜梯歼敌百余人。红军击溃喀尔丹斯驻守1个团乘胜南进，在梅花山全歼敌军1个连。红三十军先头部队进至崇化以北黄草坪，遇敌军1个团和500余地方武装堵击，遂歼其200余人，俘虏100余人。

刘文辉部驻防大金川东岸两个团，被红军追逃崇化渡河南溃，红三十军占崇化。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八十一团经得胜梯越万里城梁子向两河口

进发。杨森向廷瑞部驻两河口两个团和1个手枪营被击溃，被俘100余人，缴枪200余支。红二十七师向抚边进攻，驻守抚边杨汉域第三混成旅一部逃向懋功县城，向廷瑞逃向达维。红军占领抚边，又歼驻抚边火药坪敌第四混成旅1个营，俘80余人，缴枪100余支。红二十七师又经毕思满沟向花坡出击，夺得官寨、日尔寨。红八十一团转攻达维，击溃驻守敌第四混成旅，俘500余人，缴枪400余支。红三十军占领崇化后，兵分两路东进懋功。红八十九师攻占喇嘛寺、卡坝桥后也向懋功县城进攻。懋功县城守军经美诺沟溃逃。红二十七师占领达维后分兵两路，一路抄懋功县城后路消灭溃逃两营驻防军；一路追击溃逃至夹金山四混成旅十团和由懋功溃退的三混成旅1个团。此后，红二十七师转向驻守日隆关、巴郎山一带邓锡侯特科一团发起攻击，歼敌200余人，敌残部向巴朗山溃逃，红军占领日隆关。

10月8—22日，绥崇丹懋战役历时15天结束，红军击溃杨森、刘文辉、邓锡侯各部16个团和部分地方武装。俘获人枪各3000余，占领丹巴、懋功等要镇。

（作者单位：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

长征途中毛泽东与三枚铜元的故事

□ 颜林

在川滇黔三省交界“鸡鸣三省”的地方石厢子，毛泽东长征时期居住过的一间屋子里，一根被柴烟熏得乌黑乌黑的房柱裂缝中，镶嵌着三枚铜元。铜元边缘经过打磨后光亮无比，阳光折射，熠熠生辉。这三枚铜元，已经镶嵌在房柱里面80周年了，讲述了80年前红军长征途中伟人毛泽东的故事，是红军长征军民鱼水情的历史见证。

故事还得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说起。遵义会议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仍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



石厢子毛泽东住地旧址



毛新宇、朱和平在“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陈列馆参观考察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进入了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2月3日也就是甲戌年腊月三十这天的傍晚，中央军委纵队抵达“鸡鸣三省”石厢子。石厢子是川南边陲叙永县南面山区的一个偏僻小山村，濒临赤水河畔，南与贵州接壤，西与云南毗邻；雄鸡报晓，三省可闻；这里四面环山，古木参天，怪石嶙峋，地势险要，一块形似箱子的巨石矗立场头，故名石厢

子。

按照红军总部安排，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几位领导住进了一间木质结构的瓦房，房主叫肖有恩。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领导在石厢子运筹帷幄，研究红军的作战方针和行动计划，通宵达旦地开会度过了除夕之夜。

2月4日，正值乙亥年正月初一，为了让中央领导和战士们在新春佳节吃上红烧肉，红军宰杀了国民党团总吴联山家的两只大肥猪，做好“红烧肉”，煮好“全猪汤”，与当地群众一起吃了一顿丰富的“年夜饭”，度过了长征途中一个



开心的新年。在毛泽东住的瓦房里，毛泽东叫警卫员端来一大碗“红烧肉”，亲手送给房东肖有恩，算是对主人的酬谢，也算是共度新春佳节。毛泽东对人和霭可亲，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特别喜欢的“红烧肉”，一边与肖有恩亲切交谈，了解当地基本情况和风土人情。当时，肖有恩只知道红军的几个大官住在自己家里，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由于红军一军团二师未能攻下叙永县城，各路敌军又向叙永合围，毛泽东指挥红军向敌人兵力空虚的川滇边境扎西转移。2月5日即正月初二这天上午10点过，毛泽东向房东肖有恩道别。为了感谢肖有恩家提供住宿，毛泽东拿出三枚铜元送给了肖有恩。红军走后，肖有恩将三枚铜元珍藏了起来。后来，肖有恩害怕土匪和地主恶霸知道后前来抢夺，便悄悄地把三枚铜元钉在自己家中一根房柱的裂缝里隐藏起来，还在裂缝处抹了一些与房柱颜色相同的泥巴。肖有恩曾经多次对儿女们说：“1935年春节，红军住在我家的时候，一个大官对人十分和善，走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三枚铜板。”但他始终没有告诉儿女三枚铜元藏在什么地方。解放后，肖有恩买了一张毛泽东主席的像挂在家里，才知道当年送三枚

铜元给他的竟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肖有恩去世后，三枚铜元的去向成谜。这个故事流传了几十年，人们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三枚铜元。

直到2014年春，肖有恩的孙子肖为勤在修缮老屋时，才无意中发现了这三枚铜元。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肖为勤说：“当年，毛主席送三枚铜元给我爷爷。我爷爷说不要他的，他说你拿着吧。我爷爷把它钉在这柱子里藏了起来。后来我整房子，才发现在这柱子里面。”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暨“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毛泽东主席的嫡孙毛新宇少将、朱德委员长的嫡孙朱和平少将及无数专家学者先后前来石厢子参观考察红军长征的遗址遗迹。在毛泽东主席石厢子居住处旧址肖有恩家，毛新宇少将和朱和平少将参观了室内陈列物品和镶嵌在房柱中的三枚铜元，认真倾听了三枚铜元的故事，对叙永县妥善保护毛泽东主席居住处、“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会址、中央红军没收委员会旧址等红军长征遗址遗迹的原貌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叙永县积极弘扬红军长征精神的做法表示赞赏，就如何更好的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理想信念、强烈的民生情怀、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和严格的家风传教提出建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党史专家李忠杰抚摸着镶嵌在房柱中的三枚铜元，意味深长地说：“镶嵌在木柱上的三枚铜元，是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竖立的一块丰碑，是中国共产党人亲民爱民的口碑，是永远竖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心碑。”红军长征精神是永存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也



镶嵌在肖有恩家房柱上的三枚铜元

是党之魂、军之魂、民族之魂的最高体现。红军长征精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都应该世代相传，发扬光大，它将激励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万里长征中奋发图强，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

（作者单位：叙永县政协）

革命老区通江人民的历史贡献漫谈

□ 闫丕川



通江县素有“一府三乡”（川陕苏区首府、中国红军之乡、中国银耳之乡、中国溶洞之乡）的美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以通江为首府，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创建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和苏区人民，在建设和保卫苏区的伟大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浇灌着这块红色土地，孕育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江人民踊跃抗战支前，为赢得抗战胜利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史诗。新中国

建设时期，通江人民百折不挠，用执着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异常的艰辛。

举巴山烽火育红军精神

通江为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32年12月，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战略转移，翻秦岭、越巴山，从两河口入川，一路征战，一路宣传。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仅通江境内就发展党员200多名。193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旧县署二堂召开，选举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员会。2月17日，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在通江县城旧县署大堂召开，按照《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原则，起草和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选举产生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委共辖2个道委、23个县委、1个市委和160多个区、990多个乡、4300多个村党组织，其中，仅通江的“三县两特区”就层层建立了县、区、乡党组织176个。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曾任中共通江县委书记，傅崇碧将军曾任中共赤江县委书记。1934年1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赤江县委驻地（今四川省通江县毛浴古镇）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党政工作会议，确定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军训词，这16字是红军精神的高度概括。通江坚实的群众基础使党的力量迅速壮大，为中国革命积蓄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通江为川陕苏区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红四方面军总部迁至通江后，因战事不断、伤员众多、经济薄弱、军事供给不足，遂把重心转移到军事补给和经济发展上，在通江县永安镇得汉城创办了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被服厂、铁工厂、草鞋厂、纺纱厂、工农银行等军需民用工厂25个，在沙溪镇王坪村建起了红军总医院和一些分医院，从此，通江成了川陕苏区最坚强的后勤保障基地。两年内，红军的冬、夏服保证了统一供给；红军所需雨具、防滑掌（脚码子）、饭碗（木质）等其他用



品均得到了保障；兵工厂生产了白药（发射药）、炸药、子弹、迫击炮弹、手榴弹等，其中手榴弹保障了全军的需要；红军伤员得到有效救治，很多又重返战场。同时，按照“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发动和组织群众，禁鸦片、种粮食、兴水利、修道路、办学校、促商贸，开展生产自救，保障了军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为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红四方面军在通江的两年多时间，建立了最完备的组织系统，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基础。

通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当年23万通江儿女有4.8万人参加红军，他们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经过历次战斗，到新中国成立时，仅幸存4000多人，其中何政文、傅崇碧、陈彬等10人成长为共和国第一代将军。通江10多万群众参加了地方武装和支前组织，村村建有担架队、运输队和洗衣队，担负着提供给养、保卫后方、支援前线的繁重任务，全县共支援粮食5千万斤，牺牲群众万余人。在红军撤离通江后，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等反动武装，对参加红军和苏维埃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施以了惨无人道的报复迫害。据中央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的部分调查统计，红军撤离后，通江县被杀害924人、霸产27户、烧房485间。1951年8月，王维舟、余洪远率领中央

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川陕分团在通江县王坪村隆重举行了祭拜川陕苏区烈士墓典礼，告慰红军英灵。

铸巴蜀忠魂谱抗日壮歌

宣传抗战，鼓舞民众。七七事变后，通江人民通过报纸、电台、戏剧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动员全县人民支援抗战。1938年春，各界爱国人士组成了通江县抗日宣传委员会。1939年4月，成立了通江县动员抗战话剧团。中共地下党员肖仲鼎，以“发展实业、支援前线”为号召，办起纸厂、松烟厂、石墨厂，筹集抗经费；平溪乡小学教员湛清藩主动请缨，在申请书上写道：“愤倭寇之俘虏，时深敌忾，自愿参军抗日，恳于录用”；春载乡名儒王松听到武汉失守愤怒地写下声讨侵略者，鼓舞我军斗志的诗章；通江中学组织了“暑期兵役宣传活动”，每区镇一个分队，讲解兵役法，学习军事知识，揭露日寇暴行。全县支援抗日的舆论家喻户晓，群众性抵制日货、游行示威等抗日民主运动空前高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浪潮。

抗战爆发后，5000多名通江儿女告别家乡，踏上征程，投身于战火纷飞的抗战前线，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搏斗。1937年8月底，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抽派数千名通江籍干部战士，在陕西三原编入八路军第129师等部，跟随刘伯承、徐向前驰骋华北抗日前线，许多人参加

了平型关、五十里铺、阳明堡、神头岭、响堂铺等大小战役，经历过百团大战、反“扫荡”斗争。200余名知识青年加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大多长眠在异国他乡。据《通江县历史编年记》统计，通江县1938—1945年的8年时间里，共入伍参加抗日5287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3.2%；据不完全统计，阵亡人数达2000余人。

无私捐助，支援前线。在灾害连年、米珠薪桂的八年抗战中，通江人民同仇敌忾，节衣缩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大限度地保证前线所需，共捐抗战经费150多万元，交售军粮46万余石，购买胜利同盟券币44万元，向“九·一八”节约建国储蓄会储蓄11万元，捐募、护送出国壮丁费12万元，向前方将士献金7千元，捐募航空费71.61万元，捐慰劳前方将士费58万元，送慰劳品折价57万元。在众多捐钱捐物乃至“一县一机”（捐钱买飞机）活动中，通江人民常是倾其所有，以至十室九空。

鼓励抗战，优待抗属。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通江县作出“抗战军人浴血杀敌，为国家民族争取最后胜利，亟应尊重、优待军人家属，应发动社会之力量，协同切实办理”“抗战官兵如确属困难者，其子女读书免收学籍各费；各项捐款免征，如无力耕种田地者应设法帮助；有死亡，各保可酬金慰劳”等加强

优待抗属工作的决定。1942年8月，通江参议会召开第七次会议，拟发了“慰劳本县出征军人及家属电文”，以勉励军人努力作战。1944年12月，为对抗战军人家庭实行优待，县政府将全县积谷提拨3/5作优待谷，计10295石，散发给各乡镇抗战家属。1945年1月8日，县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发给36名自愿从军青年人平稻谷5市石。

展老区风采立建设新功

抗美援朝，同仇敌忾保家卫国。1950年12月中旬开始，通江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暨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1951年3月上旬，县内抗美援朝运动进入“推广阶段”，共抽调县城学校师生及部分青年77人，组成4个宣传队，走遍全县各场镇、乡村，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春节前后，耍龙灯狮子的吉语及花鼓、金钱板、戏剧、拜年片等均以抗美援朝为内容。3月中旬，妇代会、人代会、宣传工作队、青代会等同时召开，会后再次组织636人下乡进一步宣传抗美援朝，使县内抗美援朝运动进入“普及阶段”。通过宣传发动，全县各地相继开展爱国示威游行活动，参与人数达16万余人，并有近2000名通江儿女报名入伍，赴朝参战。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协助县政府发动爱国签名活动，签名者达全县总人口60%以上，写慰问志愿军信件4200余件；先后协助捐献“新川北号”“鲁迅号”“川北教工号”等战

机，超额完成10.5亿元目标。

外调粮食，倾力支援共济时艰。1960—1961年，中央发出调粮紧急指示，要求各地立即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抢时间、抢任务，把一切能够调运的粮食尽快调出，以保证京、津、沪、辽之急需。通江县人委立即成立了以县长王本琇为指挥长的调粮运输指挥部，各区亦相应成立了以区长为组长的粮食加工、集运领导小组，并奉命六个月内调出粮食4112万公斤。在“以粮为纲，先外后内，先上后下，服从整体，顾全大局”的原则下，各部门紧密配合，广泛发动群众，立即组织所有劳力，投入大加工、大集运，组织木船556只通宵达旦、日夜兼程赶运。省粮食局粮运二队、省钢铁运输公司等4个汽车队，济南军区汽车连等共200余辆汽车来县赶运调粮，南京军区车辆也曾来突击运输。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通江人民在遭受严重旱灾、粮食大幅减产的情况下，为支援国家建设，勒紧腰带、顾全大局，1960年调粮3960万公斤，1961年调粮3297万公斤，有力支援了京、津、沪、辽的军需民用，开创了通江调粮史上的最高峰。

襄渝铁路，西段会战攻坚克难。1970年，遵照省、地革委的统一部署，县革委组建“襄渝铁路西段会战通江民兵团”3162人，进驻万源县参加襄渝铁路西段会战，总投工

164.13万个工日。5月10日，通江民兵团先遣队280人上场设营，其余人员于6月到达万源县境内的水田、元滩、渔渡等公社，在30多公里的深山峡谷之中，承担起修建双（河）白（沙）公路老河口至东风坝段公路任务。历经8个月的战斗，共开挖土石方494621立方米，建造中小型石桥2座、大小涵洞23个，圆满完成了总长度为8756米的修路任务。1971年6月，通江民兵团奉命东进大巴山，承担扩、建、养护渔（渡）岔（河口）公路，开挖铁路正线施工的大拉沟，突击大巴山隧道的整体安装等繁重任务，先后战斗在“山脚入深潭，山峰插云间，山梁似刀口，石头硬又尖”的关公梁、老虎口、黑风口和“上看青天一线，下看激流险滩，两岸悬崖峭壁，出入十分困难”的黑水河、观音岩、鸡窝洞、一线天等天险难关，共养护、扩建渔岔公路35公里，开挖三线隧道41405立方米安装大巴山隧道内220多米的整体道床，顺利完成任务。1972年12月，通江民兵团全体指战员分批撤回通江，历时两年零七个月的襄渝铁路西段会战结束。襄渝会战，通江儿女以执着的追求，奋力谱写了“团结奋战，艰苦拼搏，抗灾抢险，无私奉献”的建设赞歌。

（作者系通江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的早期传播（1929—1950）*

□ 聂文晶

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早期传播的过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的早期传播可以追溯到1929年冬，中共四川省委派廖文彬到西昌进行党建工作。廖文彬，字志生，1900年出生于西昌市廖家碾，可谓在凉山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回到西昌后，以宁远联立中学训育主任身份为掩护，在学生中秘密组织新文学研究会、邛泸益智读书会等进步团体，通过介绍十月革命的历史、《苏俄视察记》等进步书刊宣传新思想。在他的启迪下，一些进步学生开始接触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便从中发展党员，于1931年建立了凉山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西昌特别支部，党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宣传共产主义的道理，发展党员^[1]，并规定党员每月秘密聚会一次，向组织汇报阅读革命书籍的体会。

1935年初，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凉山境内，沿途通

过各种途径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贴写大量标语、布告、宣传画，如朱德总司令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四川的工农群众暴动起来，打财富去”

“打倒土豪，分田地”“汉彝是一家”“红军不打彝人，红军不打老百姓”等；在各地召开群众大会，讲解红军的宗旨和纪律，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号召各族群众团结起来反抗压迫；用打快板、演唱、演剧等文艺表演形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主张；主动走访群众，通过谈心的方式宣传红军的主张。红军所到之处，不仅爱民守纪，还释放当地监狱坐质换班的彝汉群众，打富济贫，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彝汉群众的拥护，为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打下了良好基础。随着红军北上，群众



组织和武装被镇压，马克思主义传播转入低潮。

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8月，川康特委重建西昌特支，一年后改建为中共西昌中心特支。随着党的抗日救亡方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的传播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是继续以学校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不少地下党员在西昌、会理、礼州、甘洛、德昌等中小学，以校长或教师身份为掩护，通过成立读书会、文艺习作会、假期宣传队、补习班等组织，向爱国师生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二是利用各种书刊宣传马克思主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2012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学术梯队建设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的早期传播”（12SZYTD21）。

义。1938年7月,《新华日报》在礼州建立推销点,直接促进了党的思想主张在凉山地区的传播。8月,西昌特支创办《抗日周刊》,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在冕宁开办“春新”“七七”“宁化”三家私营书店出售《新华日报》《铁流》等进步书刊。三是通过演讲、演剧、教唱革命歌曲等文艺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礼州,地下党组织进步学生利用节假日在街头教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用讲演、相声、金钱板、演文明戏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2]在冕宁,地下党组织“儿童先锋剧团”排演了《松花江上》《送郎参军》《八路军大战平型关》等歌舞节目。^[3]四是注重加强对新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西昌特支通过各种渠道,从外地买进《列宁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唯物辩证法》等多种革命书刊,在冕宁文蔚小学设立图书室;还组织新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党的知识,鼓励有自学能力的人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提高党员的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1941年,“皖南事变”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转入隐蔽阶段。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凉山各地党组织逐步

重建,并根据川康特委的指示,大力发展农村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与此相应,1947年秋后,各地党组织也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从过去在城镇以知识分子为主转为在农村以贫苦农民和少数民族为主,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传播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转变。在会理,地下党组织在城区银行界、学校中积极传阅《大众哲学》《列宁主义问题》《整风文献》《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培养了一批工人、店员、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入党。这些党员经常化装成农民、小贩、教书先生,走乡串户和贫苦农民交朋友,教农民识字,利用农民原有的“齐心会”“月亮会”“碗会”等组织,讲解解放战争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土改政策,激发他们参加革命的阶级觉悟。^[4]在越西,地下党组织成立了“农民互助会”,通过发展的农民党员对其它贫农进行宣传动员,很快团结了一大批农民积极分子。^[5]在冕宁,1947年夏,地下党员王月生在宏模乡蜡拉白彝族聚居村创办了一所彝民小学,边学习彝语彝文边教学,逐渐在贫苦彝族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党的民族政策。^[6]在苍溪实验乡,冕宁党组织在边民学校利用学校教育,向彝族学生包括一些家长宣传党的知识和革

命道理,并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发表的《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等文章。^[7]

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早期传播的特点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等原因,凉山地区消息闭塞,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民族关系复杂,反动统治力量犬牙交错,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并不成熟。在这种敌强我弱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传播的主要特点是因时制宜,以学校为基地向社会遍撒火种,不断积累与扩大影响。

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基础。1935年红军长征过凉山之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西昌、冕宁、越西等城区学校的部分进步师生中通过学习进步报刊、讲解革命道理等方式传播,影响有限。随后,历经红军长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三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步步由城镇发展到农村,由学校辐射到社会,由中小学师生逐步转向工人、农民、职员、店员、少数民族等广大群众,影响不断扩大。

密切结合实践,在实践斗争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在凉山地区,地下党组织始终注重把宣传马克思主义与



发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等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如国民党挑起内战后，中共西昌县委组织群众惩治地方恶霸，既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又在斗争中教育和锻炼了人民群众，有利于人民群众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

密切联系当地实际，有选择、有重点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较内地而言，凉山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压迫深重，社会发展落后，因此，马克思主义在这里的传播集中体现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民族平等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这三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早期传播的原因

凉山地区革命斗争的蓬勃兴起，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群众基础。1840年鸦片战争后，凉山地区仍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广大奴隶和劳动群众为争取人身自由和反对剥削压迫，进行过拉库起义、会理“娃子寨起义”等多次反抗斗争。随着西方侵略势力的渗入，凉山地区成为国内种植鸦片和吸食鸦片的重灾区。而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剥削制度的揭露，对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通过开展阶级斗争推翻剥削阶级压迫的启示，适应了凉山地区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并为革命的继续深入指明了正

确的方向。

凉山邻近地区先进思想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的输入提供了重要渠道。如曾昌礼曾引荐了不少云南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到盐边开展活动。1942年，由他引荐的云南党员王济平到盐边学校任教，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并对学生灌输爱国家、爱民族、救亡图存等观念，向学生讲苏联的社会制度优势，深受学生爱戴。^[9]又如，四川大学地下党员李黎在解放前夕来到西昌，以当地进步青年组织的读书会为基础，进一步充实读书内容，除学习《呐喊》《大众哲学》等书，还增学《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唤醒更多的青年人向党组织靠拢。^[10]

大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努力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社会载体。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席卷全国，远离北京、上海的凉山也不例外，不少有志青年走出凉山，远赴他乡，寻求先进的思想武器与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有部分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如西昌人童光敏、会理人姚宗贤、冕宁人陈野苹等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回到凉山，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正是由于这些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忠于信仰，甘于牺牲，坚持在彝汉杂居的

边远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的逐步传播。

解放前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的早期传播，虽然较内地晚，影响也有限，但历经艰难，从未中断。不仅给封闭落后的凉山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提高了凉山人民的思想觉悟，推动了凉山地区革命实践的发展，也促进了凉山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优秀干部，为解放凉山、推动凉山的变迁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 [1]《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 [2]《西昌市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1985年，第65页。
- [3]《凉山彝族自治州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2791页。
- [4][6][9][10]《中国共产党西昌地下组织始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98、61、351页。
- [5]《越西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444页。
- [7]《沧桑凉山——瓦渣木基谈话录》，凉山州彝族历史文化研究会编印，2009年，第127页。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家谱亦称为族谱，远古各时期因历史缘故难见源流。现存的族谱，主要是北宋以来民间编修的，以特殊形式记载一姓世系和人物事迹的史书。由于时代、地域或记载范围的不同，谱书拥有族谱、宗谱、家乘、家谍、通谱、总谱、房谱、支谱等称谓。家之有谱，犹县之有志、国之有史。家谱、方志和史书，构成了史籍大厦的三大支柱，就数量和收藏而言，家谱独占鳌头。用“记”的方式来书写一族人的源流过程，也是谱书写法上的发展。

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张海瀛先生在修谱全书的序言中说：“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和九品中正制度的废除，科举取仕成为选用官员的基本途径。这样就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由血缘关系决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格局，清除了笼罩在血缘宗族关系上的政治阴影，从而唤醒了人们的骨肉之情。自北宋起，许多文人学士挺身而出带头修谱。诸如，欧阳修有《欧阳氏谱图》，苏洵有《苏氏族谱》，曾肇有《曾氏谱图》，朱熹有《茶院朱氏族谱》等等，其中欧阳修和苏洵所创立的编修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史称‘欧苏谱例’。……随着修谱规模的扩大和宗族人口的繁衍，这种大宗谱越修规模越大、覆盖范围越广。这种以血缘世系为纽带编修的家谱，就成了

‘尊祖收族’、联络宗支和族人的主要形式，由同一家谱联络起来的宗支和族人，就成了枝相连、气相投、血脉相贯的一家人。这样一来，族谱也就成了族人特别是徙居他乡和海外的族人‘寻根谒祖’的基本依

越而创立楚国。熊氏族人上起轩辕下至楚霸南疆，再到当今，悠悠五千年，传承150多代，多少兴衰，多少荣耻，多少英烈事迹，太史公之古典可考，郢都之源流能稽。楚国自公元前1042年成王封熊绎于

《鬻熊楚裔记》序言

□ 黄启国

据，并且世代相传，沿袭至今，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史不作无知一代之盛哲，谱不序无知一族之英奇。”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疆域最广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美丽富饶，文化内涵丰富。熊姓人就是孕育在这块肥沃土地上的古老氏族，有着悠长的历史、源远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及民族文化由野蛮跨入文明的过程中，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期间，有黄帝统一天下、结束战乱、人民安居、创造发明、造福人类的伟大功绩；黄帝后裔第9世起就有穴熊、熊罴、熊服、熊髡在社会的上层活动。到黄帝第36世，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鬻熊因辅周朝功勋卓

楚蛮，到公元前223年楚并于秦，共820余年，传承29世，历经43位楚君。楚国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北征南扩立威定霸，先后兼并了近60多个诸侯小国。熊绎受封从国土不过百里弹丸之地、民穷国弱、兵微将寡的“蕞尔小邦”，到楚宣王熊良夫和威王熊商在位期间，楚国出现了历史上最鼎盛、最富裕的时期，历史上号称“宣威盛世”。这一时期楚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繁荣。就疆域来说，楚国势力所及达近半个中国，当时的游士苏秦曾这样描述道“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陞、郢（凡）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其最盛时人口超过500万，疆域即今湖



北、湖南、安徽、江西的全部，山东、河南、陕西的南部，江苏、浙江、上海的大部，以及广东、广西北部 and 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等地区。是中国先秦时期国祚延续时间最长的诸侯国之一，也是当时东方唯一的地域辽阔、人文鼎盛的“超级大国”。楚国在这800多年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有周文、武二王之师，楚国缔造者，文武兼学，精通韬略，德才渊博，具有修身齐家安邦治国之才的鬻熊；有《左传》记载“筼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国之君熊绎；有开疆拓土，分庭抗礼，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公然以天子自居，封三个儿子为王，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楚熊渠；有自称为王，威震中原，充分利用江汉沃土，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首创县制，在楚国和中国古代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楚武王熊通；有南定都郢，北通诸夏，图谋向东，筑楚方城的楚文王熊赧；有实霸中原，采取尊周亲诸侯政策，拓地千里的楚成王熊恽；有北上争霸，机智果断，不断向东进取的楚穆王熊商；有潜视默察，识辨忠奸，振衰起敝，重振朝纲，饮马黄河，观兵周疆，“并二十六国，开地三千里”，跻身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熊侣；有开疆拓土，使楚国以大国、强国的雄姿步入战国“七雄”之列的楚惠王

熊章；有大胆重用吴起主持变法，振兴复楚的楚悼王熊疑；有灭国拓疆，雄踞一方，号称“宣威盛世”的楚宣王熊良夫和楚威王熊商等君王。还有一批全心辅佐君王的优秀良臣，如社稷名臣令尹子文；法不徇情名相孙叔敖；杰出的教育家贤大夫申叔时；不顾个人安危冒死进谏的楚大夫伍举和苏从；至今为世人所怀念的爱国诗人屈原等等。他们都对楚国乃至中国的历史进步和先秦南方乃至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迄今为止，却少见系统介绍楚人历史的专辑，多少贤裔后嗣都在温酿牵挂。

2012年11月23日，四川召开了四川省熊氏楚裔文化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四川省鬻熊楚裔文化研究部”，决定编撰出版《鬻熊楚裔记》一卷，并推举熊仁均先生主笔编纂。这位76岁的老人，为了研究家族的历史，弘扬民族的文化，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在很多城市和乡村及山野墓地留下了寻根的足迹，让我十分感动。当仁均先生拿着书稿请我审阅并作序时，虽然深感有不少难处却也没有推辞！我认真把书稿仔细的看了看，觉得《鬻熊楚裔记》内容全面，脉络清晰，史料真实，是一部好书。《鬻熊楚裔记》记录了熊氏一族人的生息繁衍及发展的过程，不是

家谱甚是谱书。仁均先生以目录篇、屈原、源远流长、家谱文化、家族文化、家在哪里、为啥子要寻根、寻根略记、寻根组织机构、根在哪里、楚舞神州、楚国简述、楚国国王、复楚传奇、中华熊氏字派统编等为章节标题，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时间、年龄和书写编辑技能等方面的很多困难，用了600余页的篇幅，50余万字迹，谱系了自黄帝到今天152代人的传承世系，并对黄帝及后裔与43位楚王分别作了简介，述写了楚人在艰难时期，为了活命避难于云梦泽深山野林中，以筼路蓝缕的精神，从云梦泽一步一步走出来直到称霸中原，成为超强大国。把楚人的精神、楚人的文化历历展现在读者眼前，弘扬了民族文化与家族文化。《鬻熊楚裔记》是一部历史、是一部谱写熊氏人的谱书，它对历史的收集、文化的发展、楚文化的研究、谱书的撰写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为熊姓各支各派撰写族谱理清了头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一部谱书，熊仁均同志以记的名称来撰写，是家谱学上的一个新发展。

限于对熊氏族史了解不够和学识的肤浅，以上赘述，勉为序言，权且以此表示对《鬻熊楚裔记》一卷问世的祝贺！

（作者系四川省政协常委、社会法制委主任）

读清嘉庆《洪雅县志》

□ 王影聪

1984年发掘出了洪雅境内的止戈镇安宁村王华遗址，出土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等30多件，还有墓葬尸骨与陶片，证明洪雅人是眉山及川西一带最古老的居民之一，距今有万余年，比蚕丛、武阳等古城邦国的居民还早几千年。

据清嘉庆《洪雅县志》记载：“洪雅在《禹贡》梁州之域。自汉以前无稽焉。洪雅之名始于周（即北周），隋始立县。历唐、宋、元，沿革不一，复设于明成化十八年。皇清因之。其间疆域、形胜、关隘、山川，如环如带，辽阔险阻。迹之流传，风俗之浮美，物产之富饶，盖郡西南名区也。”上述文字把新县志中的历史空白作了难得的修补与完善。

该志还对洪雅的历史沿革作了详细记述：“北周置洪雅镇属洪雅县，治所在今丹棱县城厢，以县西有洪雅川得名。属齐通郡，初为齐乐郡，后隋属眉山郡。隋置眉山郡，治龙游、平羌、峨眉、眉山、洪雅（改故洪雅为丹棱，于此置洪雅县，兼带洪雅镇）、夹江、通义、丹棱、青神……元代又废洪雅，归夹江治，明代复置

洪雅。”还记载“宋太平兴国元年通义县改称眉山县。”以上记载证明了洪雅的瓦屋山以及峨眉山，同属一个州郡管辖，苏东坡的诗作《寄黎眉州》中“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就是家乡的二座名山。也驳斥了当今有人断言瓦屋峨眉二山分属两州郡的无知。

该志还记，洪雅“江山佳胜”，在北宋绍圣有碑记：“环山带江，佳气秀发。峨眉、瓦屋固护于外，月珠、洞溪，回绕其中”。这里“俗厚风淳，人勤稼穡，文学渐兴，争讼日息，氏业农桑，不嫫商贾，文学渐盛，少长有礼。”“村落之民，有白首不见官府者。”

在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名山大川多，人才也不少。著名代表就是田锡。他是北宋一代名臣。他在家乡县城西北五里处修文山读书，留下了读书台、洗墨池等遗迹。他不仅是个直臣，还是文学史学大家，清嘉庆《洪雅县志》的艺文志中，收录了他的《赋》，有《人文化成天下赋》《圣德合天地赋》《西郊讲武赋》等24篇美妙文赋，堪称传世美文、千秋经典。难怪苏

东坡要拜这位不曾见过面的先贤作恩师，为他的奏议合编成书写序言。我还诵读了田锡唯一记录留在该志艺文志中的题为《秋夜有怀寄副翰宋白舍人》的诗：“秋声萧瑟北山椒，赖有琴樽慰寂寥。书幌静怜斜月鉴，窗灯寒带落花挑。久辞知己来江国，少寄书音过海潮。因忆玉堂今夜直，建章宫漏夜迢迢。”

可见天下正人，朝中直臣要经受得住寂寞，甘受委屈；以廉生威，以清贫为本为怀，达到贫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千秋证明这是做人的根本、做官的根本！

读览清嘉庆《洪雅县志》，获得了新知，甚为感叹。洪雅不仅山川秀美，还是人杰地灵的胜地。这些记录传承至今，光华照人，激励后辈在这方热土上创造更多的奇迹，使古老的洪雅获得崭新的辉煌！

新知洪雅，感叹洪雅，充满了希望的洪雅……

（作者系眉山市政协主席兼市文联主席、市作协主席）



发掘族谱资源 建设特色文化

□ 温勉双

蓬溪历史悠久，人文蔚起，代有明贤，有着丰厚的书法、红色、忠孝、宗教和家族等特色文化资源。蓬溪为“梓东邹鲁，文献名邦”，素有“孝子故里”“洞经音乐发源地”“壁画之乡”等美誉。诗圣杜甫曾流寓于此作《唐兴客馆记》；明有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席书，清有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鹏翮、著名诗人张问陶等名贤仕宦出生于此；二十四孝之“孟宗哭竹”“丁兰刻木”等古遗迹至今尚存。蓬溪是“书法之乡”“革命老区”，1929年6月29日，旷继勋在蓬溪县大石桥牛角沟起义，建立了四川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蓬溪县苏维埃政府。

近年来，蓬溪县政协把文史工作作为服务和推进地方特色文化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紧紧抓住蓬溪历史文化资源，积极开展文史资料征编工作，征集文史资料稿件1000余篇、500余万字，编辑出版《蓬溪文史资料》35辑、文史专著10余部，400余万字；积极建言献策，为把蓬溪建成全国知名特色文化县和旅游地，

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100余万字，助推地方发展成效显著；充分发挥文史委的组织牵头作用和专业人才优势，着力打造精品特色文化，促进了县域经济和特色文化的协调发展，初步探索了一条文史工作服务地方发展的新路子。

政协领导高度重视，为文史工作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县政协领导始终将文史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把文史工作作为政协的一张名片来抓，政协主席亲自抓，亲自担任编委会顾问，亲自参与谋划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出版；挑选文史专家，审定文稿；确保人员、经费落实，为搞好政协文史工作提供坚实的保障。

汇聚力量，加强文史工作专兼职队伍建设。凝聚各方力量，加强全县文史队伍建设，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文史工作专兼职队伍。一是配足文史委人员。文史委有专职主任、副主任各1名，兼职副主任、委员6人。二是建立乡镇文史资料征集小组。全县20多个乡镇建立了文史资料征集小组，有成员165人，负责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三是组建文史资

料写作队伍。聘请了50余名退休老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名人，兼职文史写作。四是向外地熟悉蓬溪历史的专家学者约稿，聘请来蓬讲学。常年保持联系的县外骨干作者有30人左右。五是争取其他文史部门协作配合。请县志办、文化馆、图书馆等部门的同志利用特有条件撰写或审、改稿件，提供相应文史资料，或者共同组织出版专辑。

彰显特色，充分发挥专委会的主体作用。蓬溪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县政协充分发挥文史委的主体作用，突出文史专家的积极作用，彰显地域特色文化，深度挖掘家族文化、名人文化、客家文化资源，把研究以张鹏翮、张问陶为代表的历史名人文化作为工作重心，编辑出版“蓬溪文献丛书”；围绕明清时期蓬溪涌现出的“席、谭、张、蒲”四大家族的介绍和研究，编著出版《张问陶研究文集》《张鹏翮研究》《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沟张氏家族》《烬余录注》《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赤城春秋》《明代蜀中望

族：蓬溪席家》《川北望族：蓬溪蒲氏》等，共计200余万字，弘扬了蓬溪特色文化，保存了蓬溪文献，延续了蓬溪文脉；与四川省社科院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合作，开展蓬溪客家文化研究，在广东《客家研究辑刊》《四川客家通讯》发表论文30余篇，提高了蓬溪学术水平，推进了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拓宽领域，搭建文史工作的广阔舞台。以文史委为依托，成立了四川省第一个县级家谱收藏研究机构——蓬溪县家谱收藏研究中心。指导、支持蓬溪县问陶诗社、蓬山诗词学会、蓬溪县楹联学会、蓬溪县洞经音乐研究会等民间社团开展工作，研究蓬溪历史文化，为文史工作搭建广阔的平台。特别是对家谱的研究，走到了全省县级政协的前列。家谱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家谱收藏爱好者，进行家谱收藏研究，推进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现已搜集到古今蓬溪家谱100余部（含电子家谱），编辑出版了姓氏家谱书籍《笑问君从何处来：蓬溪姓氏备征》《蓬溪家谱序跋集》等，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蓬溪电视台、《遂宁日报》等媒体对家谱中心作了多次专访。2013年7月23—24日，协助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巴山蜀水之城市故

事》栏目摄制了《清官张鹏翮》《神断张问陶》，生动展现了他们的杰出功绩和人格魅力，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拓展视野，加强同外地的交流与联系。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借鉴各地的先进经验和成果，交流推荐蓬溪文史资料，提高蓬溪的知名度。一是赴各地搜集文史资料，为研究蓬溪地方历史文化提供第一手资料。二是促进资料共享。与中国社科院、国家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等加强联系，互换资料，扩大了蓬溪文史资料的社会影响。三是踊跃向各种刊物供稿。向全国政协、四川省政协、遂宁市政协等单位编辑出版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四川文史集萃》《农村改革逐浪高》《川中重镇遂宁市》等书刊，推荐稿件，多被采用，使蓬溪文史走向全国，“飞入寻常百姓家”。

打造精品，服务蓬溪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坚持文史工作服务地方发展，狠抓特色文化精品建设，推进了县域经济的加快发展。一是积极建言献策。结合蓬溪实际，先后提出了《打造老区品牌，做好发展文章》《打造中国书法之乡品牌，推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挖掘传承洞经文化，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提案，得到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促使有关申报命名工作的成功。二是成功助推打造红色旅游文化精品。2009年积极参与旷继勋蓬溪起义80周年筹备工作，为旷继勋纪念馆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纪念馆已被列入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是协助开发宗教文化旅游精品。同有关部门一起组织撰写《川北名胜高峰山》《蓬溪石雕》《蜀中名山高峰山》《蓬溪诗存》《蓬溪文史精选》《蓬溪县名胜诗联集》等，为蓬溪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献计出力。四是重点挖掘名人文化精品。2014年秋，以张问陶逝世2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我县召开为契机，成立了张氏文化研究会，征集第一手资料、文物，为开发名人历史文化提供可靠素材；策划打造“移民文化、名人文化、张氏文化、大旅游区”张氏故里，修复张氏祠堂、张船山墓、清代四川第一家陈列馆。

近年来，蓬溪县政协在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后，将继续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更加突出文史工作的“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勇于创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作者系蓬溪县政协主席）



提升认识促创新 推进工作上台阶

□ 侯宏

地方志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编史修志。剑阁历有修志传统，宋元修《剑州图经》《隆庆府志》《普安志》，明正德、清雍正年间均组织编修《剑州志》，民国16年（1927）修《剑阁县续志》，1992年出版《剑阁县志》。通过历代坚持不懈、笔耕不辍，最终为剑阁志史留下了宝贵财富。2015年，剑阁县进入志书编修出成果的关键阶段，第二轮《剑阁县志》完成终审，《汶川特大地震·剑阁抗震救灾志》即将完稿。现就如何持续有效推进地方志工作和编修上乘地方志书，谈几点个人看法。

提升对地方志工作的认识，更好地为社会进步服务

地方志编修起源于秦汉，继承于唐，定型于宋，发展于明，兴盛于清，具有以下特征。

地方志的百科性。地方志是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对于了解和把握国情、地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文化软实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具有独特作用。地方志和哲学社会科学一样，能够“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资政育人、服务社会”，能够“为党立言、为政存绩、为民立传、为史留鉴”。资料性、地域性、时代性、综合性、思想性、权威性和严肃性是地方志的特点和基本性质。地方志编修的指导思想 and 编纂原则由其特性决定，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才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及现状，为社会文明进步服务。

地方志的行政性。地方志工作是国家行为、政府行为，主持和推动地方志工作健康有序进行是“官责”；地方志编修是一项文化工程，重视文化建设、致力于文化繁荣是政府责任。政府应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将地方志工作纳入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严格“一纳入、八到位”，保证地方志工作有序开展。地方志办公室是组织地方志编纂和地

情资料管理的法定机构，在政府领导下严格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依法开展工作。要依法建立健全制度，用法治手段推动工作，用行政监督来规范编修行为。

地方志的垂鉴性。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具有垂鉴后世的作用，凝聚着一个地方的优秀文化，是社会事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的地方志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后世以志为鉴提供了基础。随着地方志事业的不断推进，地方志在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社会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必将为各地三个文明建设的和谐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创新工作方法，做好新形势下的地方志工作

强化领导抓组织。第二轮修志工作启动，特别是《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实施，标志着地方志的工作格局和管理体系已基本形成。剑阁县明确了地方志编修工作务必严格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人大监督，政协参与”的要求，在

地方志编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年初组织召开全县地方志工作会议，对2015年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做到了工作早安排、早行动。每个重要环节，又召开专题研究会，对当前工作进行科学研判，对下步工作进行再安排、再细化、再落实。同时，建立严格的目标管理机制，每年县委、县政府将修志工作纳入全县目标考核，有效推动了地方志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强化动员抓整合。地方志编修工作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是由小部门成就的大事业，涉及一个地区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具有十分突出的复杂性、系统性和艰巨性。以剑阁为例，要想高质量地完成编修工作，需动员县级各部门、乡镇、学校、医院、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为确保效果，今年以来县政府先后10次专题研究《剑阁县志》《汶川特大地震·剑阁抗震救灾志》编修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为全面完成年度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营造了“众人成志”的良好氛围。

强化创新抓特色。全面、客观记述17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第二轮修志的首要任务，也是第二轮修志的共性，地方志工作者应善于在共性中找出个性。剑阁有与其他县区



不同的历史经历：县人民政府住址的变迁、剑门关旅游业的灾后崛起等。同时，地方志编纂还必须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行业特点和民族特点，必须从时代变化中寻求篇目设计创新。找准特色是提高第二轮志书质量的关键环节，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是摆在第二轮修志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求真务实，高质量高标准编修地方志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是志书的價值所在，是志书保持生命力的前提。志书质量涉及政治观点、体例、篇目设置以及审稿、出版等，求真务实是保证志书质量的关键，要贯穿地方志工作的始终。

一是修志队伍要求求真务实。在修志的过程中，要坚持与时俱进，通过大胆使用人才、聘用专业人才、培训人才等，提升修志队伍素质，提高

志书内容质量。二是资料收集要求求真务实。地方志的编修资料收集、整理、核实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的态度，确保搜集的资料准确、真实。三是逐级审查要求求真务实。志书审查过程是确保志书质量的重要环节，应坚持以务实求真的态度，严格按照志书审定“三审一批准”原则进行审查审定，为精品良志奠定基础。

地方志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我们要充分发挥好地方志在教育群众、服务社会、推动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服务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依法治县、繁荣文化、防灾减灾等领域，更好地为县委、县政府决策管理提供参考，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作者系剑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第一次听说“然并卵”，是被妻女如同游戏般考问。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许久、日常文字使用“作古正经”的我，当然是茫然不知所云。在翻查字典辞海不得其解之后，“不耻下问”兼带求助网络，对“然并卵”终于有了大概了解：2015网络新词；与“城

中，喷薄、爆发、流布四方了。

初步明了，便要尝鲜。去网上查找了一个典型“例句”：“好好学习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考上大学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也不一定能买得起房，买了房也不一定能找到老婆，找到老婆也不一定能生个孩子，生个孩子也不

邦机构有权监管德州化肥厂；而一向斜视、鄙视反正很少正视中国的西方主流媒体，也不得不如实承认：中国对危化品严密管制的法规、制度，较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抛开血肉之躯转瞬人间蒸发的无语，抛开有些崇高比堕落还要败坏的况境，抛开“无用”知识有用性的高深及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功利与不确定，总坚信底层往往可以决定底色，小人物、小作为、小细节的累积，往往可以固化历史与时代的某个方向、趋势和环节，总觉得在精神层面不能丢失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丈夫豪气，在心理层面不能让庸俗的拜物主义盛行，面对最爱、最珍惜的消失的无可挽回，我们还能够有一点坚信：一点星光，可以闪亮天际；星星火花，可以映红整个寰宇，那星光和火花，便是我们自己。

因此，在“然并卵”火爆的当下，不合时宜地套用中国形象展示片中的一句话：你若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推而广之，你若刚强，中国便不柔弱；你若文明，中国便不蒙昧；你不阴鸷，世间便多明媚；你若花开，满眼便多灿烂；你在前进，中国便多有一份不后退，你在平凡的岗位上认真，中国便确实少了一份扯淡；面对诱惑你不出轨，家庭就多了一份稳定，维护公平正义你敢发声，社会就增添了一丝温暖和谐；……

总之，你减少一个“然并卵”，中国就多一个“不心甘”；你坚持了一分“不松劲”，世界就多了一份“一定行”！

打望思量“然并卵”

□ 蝉 羽

会玩”“乡话多”等同为网络“新三字经”名词；“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的缩略词；社会大众特别是“新新人类”对一些看上去很复杂高端，但事实证明完全没有什么实质效果、功用、收益的事情、事物的无奈、调侃之表达。

虽然当下的许多现实早已让我们练就了见怪不怪的深厚功力，但类似“然并卵”这种生鲜词汇的猛然蹿红，还是有些出于我辈的意料。创意、构造、逻辑、音韵等等都不入流，单是一个平常不出众口、不入室登堂的“卵”字，便显得有些肮脏，有些下作，有些宣泄，有些无奈，有些对己自黑对人强蛮，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欲说还休欲哭无泪。

然而它就一夜爆红而流行于大众了。在“存在的便是合理的”这个意义上，它和“它们”，起码是准确表述了某些社会现实，迎合了某些社会心理，击中了一些大众隐私，满足了一些大众口味，激活了一些大众期盼，从巍巍乎高山、森森乎大海“高大上”的裂隙

一定是自己的。”结论就是费了天大牛劲长了通天本事，结果还不是一个——“然并卵”！

放眼寰球，思量身边，可以印证其“正确性”的事例果然难以枚举。古旧有如战国群雄割据，一代紧接一代逐鹿，数风流人物在自然法则面前早已成云烟飘散；新鲜的如周郭令徐苏等欲望膨胀机关算尽终难逃一朝铛银白发疯长。远一些，2013年4月17日，世上最大发达国家美国德克萨斯一家化肥工厂发生致命大爆炸，35人死亡，超过160人受伤，约70栋民宅被毁，爆炸震撼力之强大，引致美国地质调查局将其定为一个2.1级地震。殷鉴不远，却同难避国殇。在地球的另一面，在一年多后的2015年8月12日，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内瑞海公司发生的特大火灾爆炸，时至研墨落笔，我们只能惟愿100多条鲜活生命陨灭的数字，不再增加——“然并卵”：事后调查，根据美国法律和监管规定，至少有7家不同的州和联

全国第二轮省级志书编纂工作座谈会暨精品志书编纂研讨会在山东召开

7月7—8日，由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承办的全国第二轮省级志书编纂工作座谈会暨精品志书编纂研讨会在济南举行。山东省副省长季缙绮出席座谈会并致辞，中指组秘书长、中指组办公室党组书记兼办公室主任赵芮，中指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副主任冀祥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中指组办公室副主任刘玉宏、邱新立以及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娥出席会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武警部队共108位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采取大会交流发言和分组讨论的方式，深入总结交流二轮省（市、区）志编纂工作的经验，探讨省（市、区）志编纂工作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围绕如何开展精品志书编纂进行研讨；就进一步开展精品志书编纂出版工程、贫困民族地区志书出版资助工程及当前地方志工作的重点任务等进行安排布置和强调。山东省、北京市、广东省、河南省、江西省、湖南省就一、二轮省（市、区）志编纂工作经验做法作大会交流发言。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与省志工作处相关人员参加会议，介绍了《四川省志》编修“重调研，寻求科学的编纂方法；重规划，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任务；重指导，确保工作运行遵循志编规范；重审查，力求工作成果高质量；重出版，实现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等工作经验和体会。

（陶利辉）

何郝炬捐赠《百卷志咏》手稿

近日，93岁高龄的省老领导何郝炬同志向四川方志馆捐赠了保存多年的《百卷志咏》手稿，省志编委副巡视员汪毅代表四川方志馆接受捐赠；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代表省志编委向何老颁发收藏证书，并接受其捐赠的两幅书法作品。

何老曾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志编委主任、《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负责人等职务，出版有诗集《澄

愚集》、自传体小说《霜天晓月》（上下卷）等。在第一轮修志中，他不仅审读了《四川省志》79卷约4000万字，而且为每一卷志书和《人物志》中的若干人物写诗100首，概括性地记录了每卷志书的特点，并编入《四川省志·附录》，构成了《四川省志》的一大特点。



（志者）

“四川方志系统领导干部培训班”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举办

在省委组织部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的关心、重视下，7月31日—8月7日，“四川方志系统领导干部培训班”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举办。

培训班依托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丰富独特的革命历史资源，通过茅坪八角楼、朱毛旧居、黄洋界、三湾改编等现场教学和“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斗争简史及若干重大问题”等专题培训，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学员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切实提高我省地方志系统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强化推进四川方志事业发展的能力。

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培训通过身临其境的听课讲解，重温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进一步增进、升华了对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伟大人格的崇敬，感受到了发自灵魂深处的震撼，是一次很好的培训经历，为推动工作积蓄了能量和动力。

省志编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在开班时指出，这次培训是一次精神的朝圣之旅，思想的寻根之行，信念的锻造之举。要转变身份、当好学生，



集中精力、安心学习，融入集体、互帮互促，严格遵守学院管理规定，展现四川干部精神风貌，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

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指出，这是首次集中对我省地方志系统领导干部在国家级的干部培训学院开展委托培训，取得了预期的学习效果。主要表现为：一是各方重视，安排周密，保障得力；二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效果很好；三是氛围浓厚，争先争优，效果明显。各位学员学习收获丰厚：重温了一段重要的中国革命历史；接受了一次理想信念教育；上了一堂生动的“三严三实”教育课；增添了一份作好地方志工作的历史责任感，开拓了思路，增强了信心。要传承弘扬井冈山精神，将其内化为推动工作的动力，结合各地地方志工作发展实际，结合我省“三严三实”学习教育的要求，共同把四川的地方志事业更有力地向前推进。要传导好学习培训的成果，认真总结此次井冈山之行的点滴，保持学习激情，升华学习感悟，把学习培训的成果传达、传导给本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让井冈山精神在全省地方志系统生根、开花、结果。

四川21个市（州）和7个区（县）志办负责人、5个省级部门方志机构负责人等共41人参加培训。

（牛森）

马小彬调研新都县、阿坝州地方志工作

近日，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赴新都，专题调研地方志工作。成都市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高志刚，新都区政府副区长冯静陪同调研。

马小彬肯定新都地方志工作编纂有思路，项目推进有序，特色志书打造有力，历史文化遗产上成效显著。希望加大宝光寺佛教文化、桂湖升庵文化、客家文化和抗日名将王铭章等新都独特文化的挖掘，加大省内宣传力度，扩大新都的对外影响。木兰镇要充分利用木兰文化平台，延伸花木兰故事，搞好木兰文化的总结并与佛教文化相结合，加大招商引资，争取上级支持，发展文化与养老产业，突出客家文化和名优特产，打造名人名街，着力创建历史文化名镇、商贸镇和旅游镇。《木兰镇志》要按名镇志体例凡例要求进行

修改，注意对乡愁记忆的总结和传承，体现民风民俗；要接地气，贴近老百姓，适应社会需要，成为展示新都地域文化的窗口。

在阿坝州及理县、马尔康县、红原县、九寨沟县、松潘县、黄龙管理局调研时，马小彬建议：一是以贯彻川委办〔2015〕9号为契机，继续依法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和支持，总体部署志书编纂、藏文年鉴、志书双语出版等工作；二是州志办要依法加强对全州地方志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做好州地方志“十三五”发展规划，加大对县志工作的指导力度。继续办好办强《雪原文史》。希望九寨沟管理局在资料收集、篇目设置、内容撰写上突出自身特色，更上一层楼，力争为九寨沟、黄龙自然风景名胜这个自然遗产点上浓墨重彩的文化神韵之笔。

（新都区志办、邓瑜）

省志编委赴河南、山西、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学习“取经”

为学习兄弟省市做好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先进经验，开阔工作思路，推动创新发展，近日，省志编委重点围绕“学习贯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推进地方志工作科学发展的创新举措、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开展读志传志用志，开发利用地情资源的做法和经验；加强方志馆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做法和经验；第三轮三级志书编修的筹备情况”等问题，组织部分市（州）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赴相关省进行考察学习。



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与成都市、南充市志办及委机关相关人员前往河南、山西两省学习

考察。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与泸州市志办及委机关相关人员前往江西（及吉安市、井冈山市）、福建（及泉州市、厦门市）两省五地学习考察。副巡视员汪毅与广安市、凉山州志办及委机关相关人员赴湖南、湖北学习交流。

通过考察学习交流，考察组认为，兄弟省有许多先进思想、良好做法、成功经验值得四川学习、借鉴。

一是着眼长远抓，依法修志意识牢固。坚持从营造法治和政策环境抓起，先后出台了地方志工作法规及制度，公布权力清单，细化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从法制上保证地方志工作顺利开展；着眼建设工作长效机制，主动争取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和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各参编单位的高度重视，从而增强了各级履行法定义务和岗位职责的意识，促进了地方志工作的开展；工作从编纂志书向指导管理转变，明确了地方志机构的法制基础；不断加大地方志法规制度宣传力度，让法治观念、法治思维始终贯穿地方志工作的修志、用志、传志、管志全过程，提升了地方志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二是围绕中心做，服务大局特色鲜明。坚持着眼服务中心、服务大局，大力加强地情资源开发，充分发挥地方志工作在领导决策、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文化繁荣等方面的服务功能，使历史智慧走出深闺、为人所用；紧跟经济形式发展，积极开发地情资源，服务乡土文化建设，主动融入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为繁荣乡土文化、凝聚民心做出贡献。

三是打牢基础建，全面推进后劲十足。着眼从基本设施、基本工作、基本队伍等基础性工作抓起，蓄集长远发展后劲，推动工作创新发展。

四是着力素质升，队伍建设提质增效。采取培训、轮训等方式，加大干部培养力度；建立健全干部选拔培养方式。

（张兆法、潘认若、朱艳林）

王孝平调研南充、遂宁及省卫计委地方志工作

6月18—19日，省志编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前往南充市及嘉陵区、遂宁市及大英县开展

地方志工作专项调研。

调研组实地考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南充市方志馆、大英县文化产业园区，嘉陵区地方志办公室和大英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办公场所、人员配备、软硬件设施及方志成果情况；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南充市、遂宁市贯彻施行《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学习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及川委办〔2015〕9号文件精神，开展第二轮三级志书、年鉴、大事记编修及编纂，方志馆建设，方志队伍培养、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旧志整理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困难和意见建议等情况汇报，对难点问题进行了现场研讨。

针对下一步工作，王孝平强调，一是进一步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目标追求，争取党政领导重视，紧跟市委市政府发展战略，紧随市委市政府工作节奏，紧贴市委市政府工作中心，助力推动“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跨越。二是进一步突出依法修志、依法治志的路径追求，加强宣传灌输《条例》及9号文件，依法修志、依法治志要抓经常，抓长期，抓细节，加快推进依法治志，努力实现依法治志从行政手段向法治手段转变。三是进一步突出“存史资治教化育人”的价值追求，真正做到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要让志书活起来，用起来，让方志资料、地情资料成为领导干部的案头书，寻常百姓的家藏书。四是进一步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导向追求，着眼长远，夯实事业发展基础。综合年鉴要做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确保志书编纂质量，进一步加强读志用志、旧志整理，加快方志馆建设、信息化建设，加强口述史的整理和抢救。要坚定不移抓队伍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想事业，干部思想上严要求，政治上高标准。

7月2日，王孝平率调研组赴省卫计委，就《四川省志·卫生志（1986—2005）》《四川省志·人口和计划生育志（1986—2005）》《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医疗防疫》《四川省卫生年鉴》编纂、《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贯彻执行情况进行调研。

希望省卫计委加强联系，渠道畅通，更好的沟通和推进工作；加快《卫生志》复审进度、打磨润色，争取早日进入终审；吸取《卫生志》编纂经验，抓紧



赶上《人口和计划生育志》进度；做好《医疗防疫》出版前细节工作，争取早日出版；加强年鉴工作交流，做好保障。

（刘艳平、李海毅）

省志编委举办省直部门（行业）年鉴、大事记编纂培训会

6月12日，省志编委在成都举办省直部门（行业）年鉴、大事记编纂培训会，部分省直机关、中央驻川单位、国有大企业从事年鉴或大事记编写工作的单位共计65人参加培训。会议就部门（行业）年鉴、大事记的编写要求、注意事项、存在问题和解决途径进行解析，对部门（行业）年鉴、大事记编写工作的规范行文、提升质量、提高检索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在讲话中指出：根据两个《条例》对年鉴、大事记工作的要求，省志编委作为业务主管部门有责任和义务指导各部门（行业）的年鉴或大事记的编写工作。省直部门（行业）年鉴、大事记编写在留存历史记忆、续志资料储备、提供决策参考和积累政务经验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编纂过程中要注意严把“政治关”“体例关”“史实关”和“保密关”，努力推出经世致用、质量一流的作品，才能实现地方志工作“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目标。

《四川交通年鉴》主编、省交通运输厅史志总编室总编黄丽就年鉴的框架设计、条目编写、版式设计、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等进行专题授课。省志编委省志处处长陶利辉就部门（行业）大事记编写中存在的问题、优化措施以及大事记撰写理论做讲解和剖析。

（邓肖亭）

追忆革命先烈 坚定跟党信念——省志编委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7月1日，省志编委机关党委与成都市志办机关党支部联合组织机关30名在职党员，参观天府新区展览馆，展望四川未来发展；走进双流县革命烈士陵园（煎茶镇），瞻仰先烈事迹、缅怀革命先辈；考察籍田镇地平村红色文化长廊，探索思考地方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坚定“听党话、记党恩、跟党走”的

信念，纪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四周年。

煎茶镇革命烈士陵园长眠着65名烈士。来到陵园，全体党员怀着沉重的心情，逐一瞻仰烈士墓碑，认真拜读烈士事迹，凭吊先辈英烈。在地平村红色文化长廊，全体党员认真聆听以丁地平为代表的中共籍田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参观红色文化长廊，追忆革命先烈的英雄足迹，还与籍田镇就地情资料的收集整理、开发利用进行交流。

在兴隆湖天府新区科技城展览馆，全体党员认真听取天府新区未来5-10年的发展规划介绍，远眺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党员们一致表示：“四川的发展波澜壮阔，天府新区将再造新天府。作为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当代志者，应当不忘革命历史，不忘党的恩情，不忘党员身份，不辱光荣使命，不负美好人生，在本职岗位上践行三严三实，在履职尽责中奋力创先争优，为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厚文脉。”

（潘认若）

严守党纪国法 提高能力素养——王孝平为机关党员讲党课

6月24日，省志编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以《当代志者的能力养成与素质结构思考》为题，从“近段时间以来地方志系统违纪违法案例介绍”“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方志工作者能力、素质的要求”“古今方家对方志人才能力、素养的几点共识”“对当代志者能力培养、素质构成的粗浅认识”等四个方面，为全委党员上了生动的一堂党课。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主持会议。

王孝平说，审示、思考近期全国特别是四川地方志系统发生的典型违规违纪案例，说明清水衙门不一定“清净”，党纪国法没有“法外之地”，党政干部没有“免疫之人”。作为修志人，在思想、行动的方方面面必须讲政治、守规矩、守纪律，自觉践行“三严三实”。

王孝平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有关论述，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一到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党和国家领导对方志工作者能力素质的具体要求，以及古今文人志士对方志人才能力、

素养的几点共识，得出了方志学、方志人才学要形成气候仍任重道远的结论，并提出了加强方志队伍能力养成、素养构建的五个方面的思考：一要有忧党、爱国、为民的政治品德，二要有依法治志的法治能力，三要有精品佳志的才学储备，四要有创先争优、干事创业的价值追求，五要有经纶满腹的翩翩风度。

（潘认若）

《四川省志·政府志（1986—2005）》编纂工作会议召开

为认真贯彻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四川省志·政府志（1986—2005）》编纂工作，6月1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召开政府志编纂工作会议，重点就《四川省志·政府志（1986—2005）》初稿的审改补充和完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省政府办公厅要求参会部门（单位）进一步提高做好该项工作重要性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具体负责修志的同志，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政府工作负责、对部门工作负责的态度，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认真做好初稿审改修订工作，力争今年年底前完成初审稿修订工作并报送省志编委复审。会上，省志编委还通报了全省第二轮修志工作进展情况，对政府志下一阶段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四川省志》总编马小彬，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钟承林，58个省直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章兴海）

《四川省志·国土资源志（1986—2005）》初审会召开

6月17日，《四川省志·国土资源志（1986—2005）》初审会召开。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四川省志》总编马小彬，省国土资源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平，省国土资源厅党委委员、厅直属机关党委书记隆爱军，省国土资源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徐志文等40余人出席会议。

省国土资源厅志编办通报了志书编纂情况，表示力争8月底前按照初审评议意见，完成志书初审稿的再次修改，报送省志编委复审。与会人员就志书编纂

情况进行认真评议，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马小彬指出，《国土资源志》初稿已经数次修改，具有较好的基础，接下来要做好初审后的修改完善工作。要明确目标、分解任务、落实责任，确保高质量完成编纂任务。他还表示，省志编委会将尽力尽责做好编纂业务的指导和服务工作。

王平宣读了《四川省志·国土资源志（1986—2005）》初审意见，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他强调，要严格按照《四川省志》编纂要求做好修改完善，编修人员要认真梳理消化评议意见，厅办要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将有关责任落实到具体处室，争取早日完成编纂任务。

（黄文记）

《四川省志·烟草志（1986—2005）》编纂工作启动大会召开

7月3日，《四川省志·烟草志（1986—2005）》编纂工作启动大会召开。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四川省志》总编马小彬，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总经理、党组书记李恩华，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副局长陈章，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副巡视员商波等100余人参会，会议由李恩华主持。

陈章在动员讲话中要求各单位提高认识、不负使命，增强做好修志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明确目标、强化领导，确保修志工作任务期到必成；突出重点、注重质量，铸造精品。

李恩华指出，《烟草志》是《四川省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一是责任落实到位，二是真实反映历史，三是突出重点亮点，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马小彬通报了《四川省志（1986—2005）》编纂出版情况，希望省烟草专卖局依法加强领导，认真把好“四关”，确保志书质量；要求各参编单位认真履行职责，在编纂中突出行业特色，努力打造精品良志；表示省志编委将继续做好业务指导和服务工作。

（黄文记）

“成都方志”走进校园

5月20日，由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的“方志



成果进校园”活动走进位于成都温江的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带去了《成都精览》《成都史志（季刊）》《华阳国志（题襟馆版）》《成都旧志序跋集》《成都市志·民俗方言志》等600多册成都地方历史文化精品读物。在图书捐赠仪式上，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朱贵庆、院长陈智林对成都市志办支持教育、传播文化的举措表示衷心感谢，并邀请市志办的专家为学生举办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的专题知识讲座。市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高志刚表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李克强总理在工作报告中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市志办将责无旁贷。希望带来的书籍能为学院莘莘学子提供知识养料，更能为学生们走进社会、服务成都的建设事业开启智慧之门。他还表示，市志办将竭尽所能，努力为学院开展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

（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

德阳市志办开展“方志文化四进”活动

5月26日、6月5日，德阳市志办主任李思源、副主任赖军等到什邡市、广汉市开展“方志文化四进”活动，向什邡市、广汉市各所学校和什邡市马祖镇捐赠了《德阳市志》《汶川特大地震·德阳抗震救灾志》《汶川特大地震·德阳灾后重建图志》《德阳民俗》《德阳掌故》《德阳年鉴》《德阳三农图志》等地方志书籍。什邡市“方志文化四进活动”仪式由什邡市史志办主任党卫贵主持，什邡市副市长雷涛，马祖镇党委书记徐俊出席仪式。广汉市“方志文化四进活动”赠阅仪式在广汉市实验小学举行，广汉市志办主任黄丽主持，德阳市志办副主任赖军代表市志办讲话；广汉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袁斌代表广汉市政府致答谢辞；广汉市实验小学校长张兴述代表受赠学校发言；广汉市教育局副局长黄文健代表广汉市全体学校对市、县两级地方志办公室的赠书表示感谢。赠阅活动受到了社区广大群众和教育工作者的热切关注和一致好评。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绵阳出台《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意见》（川委办〔2015〕9号）精神，充分发

挥地方志在加快建设中国西部经济文化生态强市和科技城中的存史、资治、教化、育人作用，经市委、市政府领导同意，7月8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以绵委办〔2015〕67号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地方志工作的安排部署和要求，及时研究解决地方志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切实加强地方志工作部门班子和队伍建设。各级政府要依法履职，做到“八到位”，加快方志馆、地情网站、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地方志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实施意见》强调，地方志工作必须坚持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部门组织实施、各部门（单位）参与的工作机制；认真贯彻落实两个《条例》等法规、规章，全面推进依法治志，坚持依法修志、依法用志、依法传志、依法管志；坚持依法履职，做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科学谋划“志、鉴、库、馆、网”全面发展，健全长效机制；坚持规范引导，鼓励社会参与，积极动员和组织各类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地方志编纂，鼓励通过政府转移委托、项目课题制等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要加强地方志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强方志馆建设，二是加强地情网站和数据库建设，实现地方志信息利用的便捷化。

《实施意见》还对切实加强志书年鉴编纂出版工作以及地方志资源收集、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元多举措推进地方志工作

继2005年全面启动二轮修志工作以来，为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广元市市本级及四县三区均将地方志工作纳入政务目标考核，2015年是广元市地方志工作攻坚出成果的关键年，广元市志办把综合志书、抗震救灾志编纂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确保质量，加快编修进度，市志办与四县三区志办分别草签了《广元市地方志系统2015年综合志书、抗震救灾志编修进度承诺书》，分别明确了综合志书的终审、市政府批准出版和出版面世进度以及抗震救灾志的初审、本级政府复审、终审、市政府批准出版和出版发行进度。在承诺

书草签后，市志办根据各县区党委、政府对本县区地方志工作的目标任务进行核对，发现部分县区签定的承诺时间与当地党委、政府要求地方志出版发行的时间不一致，与全市编修进度时间安排不一致，又与各县区重新签定承诺书，明确了目标任务。通过签订承诺书，增强了各县区地方志工作责任主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序推进了全市地方志工作，为全市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广元市地方志办公室）

内江召开2015年地方志工作会议

5月18日，内江市召开2015年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传达贯彻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14年工作，部署2015年全市地方志工作。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陈泽广强调，全市要提高认识，增强做好地方志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精心组织，全力推动地方志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加强领导，努力为地方志工作提供坚强的保障。

市政府副市长陈朗提出三点贯彻意见，一是各级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二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更大更多地支持地方志工作，三是各级地方志部门要明确努力方向，做到有为有位，使内江市地方志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会后，召开了全市地方志业务培训会，就年鉴编纂、三轮志书编修准备、旧志整理、《味在内江》等业务工作做培训指导。尤其对年鉴的栏目设置分类、内容科学质量、标点数字用法、图片选择编排、装帧设计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讲解。

（内江市地方志办公室）

乐山县干班开展读志传志用志活动

地方志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5月份以来，在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徐建群的重视关心下，《乐山市志》进入了乐山市优秀干部人才递进培养培训班。县干班全体学员主动拓展知识面，人手一套《乐山市志》，积极开展读志传志用志活动，全面深入地了解市情、地情，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增强文化软实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政治素养、思想境界。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县干班

学员纷纷表示，认真学习贯彻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意见》和《地方志工作条例》，依法用志，依法兴志，发挥地方志记载历史、传承文明、资治育人的作用，以史为鉴，充分借鉴历史经验，用历史的智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推进乐山“转型升级，美丽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南充认真学习贯彻工作会精神

近日，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全市9县（市、区）志办主任、副主任和市志办全体干部参加的会议，专题学习贯彻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

大家认为，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是省政府在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新形势、适应新常态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面总结了10年来全省地方志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深刻分析了地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机遇，明确提出了今后地方志工作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必将对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和重要指导作用。市志办主任夏建平对深入贯彻全国、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精心筹备，召开好高规格、大规模的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站在新常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安排好今后一段时期全市地方志工作。二是吃透精神，找准新常态下地方志工作再上台阶的突破点。三是狠抓落实，高质量地完成今年工作目标。

近日，南充市志办启动《南充市地方志志》资料搜集工作。举办“资料搜集及整理”专题业务培训会，结合《南充市地方志志》资料搜集篇目，对每类资料搜集的重点进行讲解说明，提出资料搜集的具体要求，明确对拖后腿、影响工作进程的县（市、区），在年度工作目标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

（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安出台贯彻省“两办意见”文件

6月2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意见》（川委办〔2015〕9号）精神，



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政、教化、育人的作用，广安市出台了《中共广安市委办公室、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广委办〔2015〕49号），提出了七条针对性与操作性强的措施，有力推动广安地方志工作向前发展。

一是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做到“八到位”。二是依法开展修志工作，市委、市政府将地方志工作纳入专项督查事项，不定期开展专项督查。三是保障地方志工作经费。四是做好地方志书编纂工作。认真做好地方志书、年鉴、地情文献的编纂出版工作与旧志整理点校出版工作。通过政府转移委托、项目课题等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积极推出一批有文化特色、有社会影响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良志。五是开发利用地方志成果，做到既保存历史文献资料，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六是规划建设方志馆（室），将方志馆（室）打造成地方志或地情资料收藏展示、地情研究咨询、地方文化交流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发挥方志馆服务社会功能。七是加强地方志队伍建设。把地方志干部培养交流、选拔任用列入统一规划，为地方志工作顺利开展提供组织保障。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魏文通调研巴中史志馆工作

近日，巴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魏文通在市政府副秘书长、政府办主任王家富陪同下，专程到市史志馆调研，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进一步做好市史志馆的布馆工作，把实体馆建设与网上馆打造结合起来，开展数字化、网络化建设，推进地方志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二是加大宣传力度，扩大社会认知，增强社会效用。要把史志馆打造成党史、地方志和地情资料收藏展示、地情研究咨询、地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基地，充分发挥史志工作服务社会的功能。三是加大资政课题调研，推出服务党委政府决策的资政成果。

（巴中市地方志办公室）

雅安召开党史方志工作会议

7月10日，雅安市召开全市党史方志工作会议。

市委副秘书长王华受市委分管领导委托，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副秘书长、政府办主任李阳军主持会议。

王华在讲话中强调，要增强做好党史方志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务实推进党史方志工作；要加强党史方志干部队伍建设。

李阳军要求全市方志部门继续贯彻落实好《地方志工作条例》《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川委办〔2015〕9号文件精神，严格志鉴质量把关，全力推进志书编纂进度。

市委党研室（市方志办）主任师伟传达了全国、全省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指组五届二次会议、第八次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对下一步做好党史方志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市委党研室（市方志办）副主任蓝志斌宣读《中共雅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关于命名雅安市雨城区上里镇红军石刻标语遗址等8处革命遗址为“雅安中共党史教育基地”的决定》，并进行了授牌仪式。

（雅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李静表扬眉山市志办工作

5月15日，眉山市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市委书记李静点名表扬了市地方志办公室，高度肯定市志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争创一流。李静说：“大家印象中，都认为市志办是比清水衙门都不如的蒸馏水部门，缺乏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与渠道，可是就是这样一群人，却始终秉承着对工作的热情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工作中主动思考，完成重点课题《两宋时期眉山进士文化研究》。该文先后被人民网·四川频道等主流媒体和《天府智库》第3期采用，还被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范锐平，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吴靖平批示作为省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资料，并高度评价。该课题阐述了两宋时期眉山人才辈出，文化繁荣的原因、意义，也为眉山做了很好的宣传”。

（眉山市地方志办公室）

甘孜试点地情书籍开发及藏文志书出版

近日，甘孜州地方志办公室到成都等地开展《康巴旧志》《尹昌衡西征》《刘文辉在西康的传奇人生》

等地情书籍的史料收集、实地调查工作，并与外聘编撰人员座谈交流，为新一轮地情书籍的编撰打下坚实基础。甘孜州将在2-3年内完成此次地情书籍开发工作，并与《落日余辉——赵尔丰康区改土归流记》前后衔接，形成州志办近年来开发的一套较为完整的地情书系。

在省志编委的统筹安排和大力支持下，甘孜州还启动了藏文志书出版试点工作。德格县被首批列入全省民族语言出版志书试点县之一，该县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德格县志》首志、《德格县志（1989-2005）》合订本的翻译出版。

（甘孜州地方志办公室）

凉山出台“两办”文件《实施意见》

近日，凉山州委办公室、州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使地方志为统筹推进“四个全面”重大部署，深入实施“三大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凉山科学发展、转型跨越、全面小康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实施意见》要求，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两《条例》一《办法》”，把地方志工作作为官职官责，依法履职尽责，切实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不断强化机构队伍和经费保障。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关于地方志工作的安排部署和要求，明确分管领导、落实专兼职人员负责部门志和年鉴编纂工作。各县（市）政府要将地方志工作依法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和政府工作任务，做到“八到位”。

《实施意见》要求，要完善地方志工作机制；要健全长效机制，将地方志工作纳入目标绩效管理考核内容；要建立健全地方志工作评估奖励机制。

《实施意见》明确，要在2020年前全面完成全州第二轮修志任务。已完成修志任务的县（市）要广泛搜集资料，为启动第三轮修志工作作好准备。各级地方志部门要认真督促指导部门志、专业志、企业志、学校志、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的编修工作。有条件的县市和单位可同时运用汉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编纂出版志书。务必做到一年一鉴、

公开出版。有条件的部门和单位要积极开展部门（行业）年鉴的编纂工作。

《实施意见》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地方志法制宣传，开展地方志执法检查。各级干部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读志传志用志，各县（市）政府要整合资源、着力加强方志馆建设，努力搞好地方志资源收集保护和开发利用，不断提高地方志资政育人和公众服务能力。

（凉山州史志办公室）

成都市锦江区地方志工作出新招

4月16日，成都市锦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研究生科研实践基地”授牌仪式。

近年来，锦江区地方志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在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新形势下，成立“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科研实践基地”，对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进一步科学认识和把握区情，进一步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推动作用。该基地的合建，不仅是为历史文化旅游专业的研究生提供实习、就业的平台，更要将地方发展与高校需求相结合，继续深入探讨进一步合作的可能和途径，达到双赢的战略合作效果，对于引导部门学生实习就业，深入发掘区情文化，面向社会，强化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6月锦江区志办正式开通微信公众平台——“锦界”。作为四川省内第一家地方志微信公众平台，“锦界”以智能手机大用户群体年轻人为主要受众，注重以鲜明活泼的形式将锦江区地情文化成果展现给广大群众，并提供便民服务，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加强互动，鼓励动员社会力量加入到地情文化的收集中。

“锦界”共分为“耍安逸、有干货、会来事”三个版块。其中，“耍安逸”版块以娱乐为导向，主要推送锦江区几大商圈和休闲旅游目的地的基本情况，立足于使用户快速了解锦江区当前的区位和娱乐生活优势；“有干货”版块则主要以锦江区已开发的历史积淀厚重地点的地情文化宣传推送为内容，向有文化需求的用户推送区内有代表性的地情文化和历史文化；另外还特别设立与用户互动的“会来事”版块，可以将



志愿者提供的地情资料收集到后台资料库中，筛选出有特色的本区地情内容，进行深度发掘，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同时扩大锦江区地情文化的收集面。

“锦界”的建立，对于进一步提高地方志工作信息化水平，践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推进地方志工作科学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锦江区地方志办公室)

成都市武侯区方志馆开馆

成都市武侯区委、区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意见》，把方志馆建设作为重大文化惠民工程来抓，于2015年5月18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九周年之际开馆。



武侯区方志馆位于集武侯区规划展示馆、档案馆、图书馆、文化馆以及高新区档案馆为一体的综合馆13楼，是武侯区地方文献资料的收藏保管和开发利用中心。方志馆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由收藏展示区、阅览区等构成，免费向公众开放，市民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借阅。

馆内现藏书3000余册，主要包括全国各地的志书、年鉴、地情资料（文字、图片、电子文档、影像）等；还收藏展示有体现武侯地域和时代特色的物品。

(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

双流召开年鉴编纂及年报工作培训会

4月24日，双流史志办组织召开了全县2015年卷《双流年鉴》编纂暨双流地方志年报工作培训会，双流

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各镇（街道）史志工作人员110余人参加会议。

双流史志办向全县史志工作人员介绍了双流县的历史沿革和会议流程，对2015年卷《双流年鉴》编纂和双流地方志年报工作的相关内容做业务指导，并就新启用的双流历史资料报送平台的操作流程进行培训强调了年鉴资料报送时间、严把材料质量关、尊重史实等要求。

会议使双流县史志工作人员进一步明确了任务，熟悉了资料报送平台的操作流程，为今年的地方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标志着双流县史志资料年报工作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正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属全省首创。

(双流县史志办公室)

北川召开县志初评会

7月7日，北川县召开《北川羌族自治县志(1988—2007)》初评会，邀请省、市专家对志稿进行全面会诊，提出评议意见。会议由北川县副县长沈丽主持。

《北川羌族自治县志(1988—2005)》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前已基本形成初稿，地震中所有稿件被毁。2010年，北川县人民政府重新启动续修县志工作，并将下限延至2007年，经过4年多的努力，形成《北川羌族自治县志(1988—2007)》初稿。2015年5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将该志列为争创全国地方志精品志书工程之一，并将于10月在厦门组织全国地方志专家进行评议。北川县政府对申报“中国地方志精品工程”高度重视，决定邀请省、市专家进行初评。

评议会上，与会专家从体例结构、行文规范、语言风格、地方特色等方面提出许多修改评议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作为北川羌族自治县第一部县志，一定要突出北川县的基本地情和特色地情，充分记述和反映羌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为争创“中国地方志精品工程”打下良好基础。

(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资中发文推进方志事业发展

两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

作的意见》下发后，内江市资中县地方志办公室积极组织学习传达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在内江市率先发出《中共资中县委办公室资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通知》（资委办〔2015〕31号），以全面提高资中县地方志工作水平，加强和改进县地方志工作，充分发挥好其社会效用，促进县地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资中县地方志办公室）

井研志办送法律志书进社区

“七一”期间，井研县志办开展走基层及党员志愿服务主题活动，深入挂联社区送法律、送文化，将《行政复议法》《应急管理手册》《井研县志》《井研年鉴》《社区教育》等法律宣传资料和文史书本送到社区，资料越来越丰富的社区阅览室将免费开放，让居民学法律懂法守法，读史志教化育人，通过阅读和交流，建设和谐社区。

（井研县地方志办公室）

峨边志办开展依法修志执法检查

6月30—7月2日，峨边县志办会同县人大、纪委监委局、法制办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县文广新局、县市场和监督管理局、县卫计局、新林镇政府等15个单位进行依法修志执法检查。检查组重点检查各单位贯彻执行《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川委办〔2015〕9号文件精神等情况，并对相关年鉴编辑工作进行了现场业务指导。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将检查意见反馈给受检单位，要求各单位对存在的问题加以整改。通过执法检查 and 现场业务指导，有效提高了地方志工作业务水平，促进了全县依法修志工作的开展。

（峨边彝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

马边全面推进乡镇部门志编纂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川委办〔2015〕9号文件精神，7月1日，马边县委办、县政府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乡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一是各乡镇、县级各部门迅速成立志书编纂机构，由一把手负总责。二是结合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制定修志方案。三是邀请市志办专家对修志编纂人员进行业务

培训。四是各单位、各部门要把修志工作纳入年度综合目标管理，做到责权明确、奖惩分明。五是乡镇志、部门志编纂出版所需经费由县财政纳入预算解决。

（马边彝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

康定扎实推进年鉴编纂

今年以来，康定市志办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意见》精神，认真念好“四字”经，扎实抓好了年鉴编纂工作。一是念好“早”字经。康定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康定年鉴〉组稿工作的通知》，对年鉴的总体设计、撰稿要求和组稿工作提出规范性要求。二是念好“严”字经。强化年鉴编纂目标责任。继续将市级各部门及各乡镇年鉴编纂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对各供稿单位实行年鉴编纂工作过程考核和半年一次集中考核，将各单位提供的部门年鉴稿件质量、图片及其他资料报送情况、保密审查情况和报送时间纳入考核内容，实行倒扣分制度，确保年鉴稿件质量。三是念好“快”字经。形成内部管理制度。每月召开一次编辑工作例会，将编纂进度进行统计通报，对于编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并讨论解决。按照“完成初稿要快、修改加工要细、出版发行要精”的要求编纂年鉴，倒排年鉴编纂出版时间表，确保年鉴按时发行。四是念好“准”字经。进一步规范稿件流程，抓好审稿环节，增加稿件返回环节，将责任编辑完成的稿件返回到各单位审核确认，再次弥补编辑过程中出现的疏漏。这样几易其稿，多次审、反复改、认真校，确保年鉴的编写水平和质量。

（康定市地方志办公室）

乡城四举措助推年鉴组稿提速增效

为提高年鉴组稿速度与质量，乡城县志办采取“聊天、见面、借力、跟踪”四举措助推组稿提速增效。一是建立年鉴编纂QQ群，以“聊天”形式每周一、五定时提醒截稿时间，并在群中答疑解惑。二是主动与各单位撰写人员联系沟通，面对面解决问题。三是改变爱口饰羞、坐等稿件的陋习，主动向县级分管领导汇报工作，借领导之力提升组稿速度和质量格局。四是跟踪服务对象，由工作人员包干到户提供服



务，随时跟踪组稿动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从源头上掌控组稿质量。

(乡城县地方志办公室)

稻城开展送志书进寺庙活动

6月17日，稻城县志办结合群众工作全覆盖活动开展志书进寺庙活动。向联系寺庙色拉乡下热乌寺赠送《稻城县志》首志、续志，并向寺庙讲解员、在寺僧人及信教群众普及史志知识，讲解稻城县的历史沿革和县情概况等内容。

(稻城县地方志办公室)

西昌贯彻落实州史志工作会议精神

凉山州史志工作会议结束后，西昌市高度重视，及时传达学习会议精神，认真谋划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史志工作。一是积极推进党史工作。加快《中国共产党西昌历史》一卷和《中共西昌市委大事记》等党史基本著作的编纂工作。进一步做好礼州会议遗址、丁佑君烈士陵园、西昌市知青博物馆等革命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以开展中央红军长征过凉山80周年紀念活动为契机，积极开展党史“六进”工作，强化党史宣传教育。二是积极推进地方志工作。加快《西昌年鉴·2015》，72部乡镇志、部门志和《西昌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工作，为领导决策提供资政。开展古籍、方志、族谱家谱、历史珍贵图片、实物的普查搜集工作并进行数字化处理，力争两年完成。加快西昌市方志馆的建设，力争年内完成装修布展。

(西昌市地方志办公室)

德昌制定《实施意见》

凉山州史志工作会议结束后，德昌县委、县政府庚即以两办名义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严格按照地方志工作“两条例一办法”等法规制度依法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切实做到“八个到位”；完善地方志工作机制，坚持分级管理、健全长效机制、加强法制建设、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志鉴编纂，强化地方志资源收集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提高资政服务能力。

(德昌县史志办公室)

普格召开年鉴编纂业务培训会

近日，普格县召开年鉴编纂业务培训会，进一步提高全县年鉴编纂人员业务素质。县委副书记兰年尔轨、县政府副县长刘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各乡镇、县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分管领导和业务人员共217人参加会议。兰年尔轨指出，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年鉴编纂工作；认真参训，提升年鉴编纂业务水平；精心组织，按时保质报送入编稿件；强化领导，确保年鉴编纂工作顺利推进。刘刚要求，广大参训人员要认真学习领会编纂业务知识要领，重视资料日常积累，注重资料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提高入编稿件质量，按时按质报送稿件。

(普格县史志办公室)

金阳召开州级评审意见落实工作会议

近日，金阳县委、县政府召开会议，就《金阳县志（1991—2010）》资料增补、内容完善进行专题研究落实。会议由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张荣安主持。县史志办和县级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张荣安指出，县志编纂委员会和编辑室要树立精品意识，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大力支持，严格按照州县级志书审查验收小组的评审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县志，力争早日出版发行，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存好史资好政服好务。

(金阳县史志办公室)

美姑认真贯彻落实“两办”《意见》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意见》下发后，美姑县积极行动，认真开展贯彻落实工作。一是县委办通过党政网，及时向各乡镇、各部门转发《意见》，要求各级各部门认真组织学习，领会文件精神。二是分管史志工作的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沙德康组织《美姑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单位集体学习《意见》，并结合实际开展讨论，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三是县委办、县政府办联合印发2015年美姑年鉴编纂方案，安排部署2015年年鉴编纂工作。四是启动《中共美姑县党代会文献选编》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美姑县史志办公室)